一五一十周刊

NO. 141
2014年2月14日

刘凯、方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谈俄罗斯的 乌克兰情结 |
张弘：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
廖笛杉、孔寒冰：转型成绩单：东欧剧变这23年

乌克兰



向欧盟还是向俄罗斯？



编者的话

去年 11 月以来的基辅，严冬与民众抗议的热情反差鲜明。由于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放弃与欧盟签署合作协定，倒向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共同体，民众纷纷走向街头，反对政府侵扰乌克兰的“欧洲梦”。对财政困难的乌克兰政府而言，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迅速带来经济利益。而在许多乌克兰人眼里，即使欧盟危机缠身，它依然象征着自由、多元和平等——尤其是和俄罗斯相比较的时候。

在乌克兰脱离苏联的纪念日，法新社来到了首都基辅，记录了抗议民众与警察的激烈冲突。在表面的激荡背后，汤中超看到了多股力量的胶着：在国家取向问题上，乌克兰究竟要“向东”还是“向西”？惯于利用司法打击政敌的执政者，岂能接受反对暗箱操作的欧盟？夹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还有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认为，乌克兰只有三个选择：顺应多数人的愿望与欧盟签协议；按照政治精英的意见加入普京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或者陷入分裂。乌克兰经济对欧盟和俄罗斯市场的依赖，以及国内对“入俄”和“入欧”的分歧，使其丧失了走出中间道路的可能。

相较于欧盟对于乌克兰入伙的耐心，俄罗斯对乌克兰可谓“极力挽留”。刘凯和方雷的研究发现，乌克兰的独立给俄罗斯经济和国防带来耻辱性的损失。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人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失去乌克兰人以及当地的沃土矿藏，俄罗斯便不再伟大。当欧美为了制衡俄罗斯而争取乌克兰的时候，莫斯科本能地想尽办法将其留在自己身边。

其实，抛开地缘政治等国际因素，乌克兰国内的形势也助长了本次危机。随着冷战铁幕的隐退，西方的自由与富裕时刻冲击着大批乌克兰人的感官，尤其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后。如奥莱尔·科茨乌巴所言，自由价值观已经一跃成

为本次抗议的思想武器。但在自由价值观的一旁，还有尚未解决的国家认同问题。张弘的研究表明，乌克兰复杂的历史造就了其在经济和文化上靠近俄罗斯的东部，但感情上更贴近欧洲的西部。巨大的认同分歧和党派林立的民主政治结合后，产生的不是国家的代表，而是地域性极强、甚至代表特定利益群体的政治家。柳建龙记述了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上任后的表现，更进一步证明民主和法治远未在乌克兰生根。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与群众意见背道而驰，进而引爆示威，也就不足为奇了。

纵观中东欧地区，权力是否受到制衡，似乎是衡量国家转型成败的重要因素。波兰前副总理莱谢·巴塞罗维茨指出，乌克兰对领导者政治权力的放纵，不仅导致贪污腐败的泛滥，而且直接破坏了市场规则，致使官僚资本主义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反观波兰，政治的相对规范使其在经济上遥遥领先。虽然中东欧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建树参差不齐，孔寒冰依然找到了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它们都在大国的势力下漂移。大国交往中的利益得失，后果要小国承担。而随着大国关系的变化，中东欧国家的漂移还将继续，朝向东方也未可知。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状┫

9-1 XAVIER COLÁS：乌克兰基辅民众大游行 要求总统下台


XAVIER COLÁS

“

乌克兰基辅民众大游行，要求总统下台！在基辅，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原因是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同欧盟签署合作协议，打破了很多民众的“欧洲梦”。 乌克兰会是下一个利比亚吗？长期徘徊在欧洲二、三等国家行列的乌克兰将何去何从？

”

本周末是乌克兰基辅脱离苏联的纪念日。这座城市的市民采取强硬立场，反对他们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数以万计的人走上街头，抗议总统拒绝签署与欧盟的贸易协定。双方就该协议已经磋商了数月。游行队伍从首都塔拉斯-舍甫琴科公园出发，涌向独立广场。独立广场在周六凌晨暴乱之后就被警察包围了起来。

面对这种局势，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基辅郊外和自己的亲信会面，研究下令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他正在研究要做什么。很有可能从明天起，总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他还没决定，”乌克兰 PBK 源引政府部门的一则消息。俄新网表示此次聚会的地点就在乌克兰总统的乡下居所。政府发言人认为目前首都的局势得到了控制。

数百人围攻总统办公室，并向警察投掷物品。警察组成人墙围住人群并避免人群占领政府大楼。此前游行者抵达广场并冲破了警方的金属路障。警察将路障安置在用来做圣诞装饰的圣诞杉木的周围。基辅一家法院已经禁止了从周六到明年 1 月 7 日在此处的所有游行活动。因为独立广场是 2004 年橙色革命的象征。

据反对派透露，广场已经聚集了多达 50 万民众，同时乌克兰内政部声称只有 15 万人。

在反对派来到之前，守护广场的警察就已经消失了。然而据乌克兰警方发言人透露，三名游行者和一百多名警察在混乱中受伤。伤者也包括法新社的两名摄影记者以及为欧洲新闻工作的一名当地摄影师。在柱子的对面，乌克兰反对党的领袖们走来，他们批评这些行为，并指责政府暗中鼓励（警察的）暴行。

反对党主要领导人维塔利-克里琴科要求亚努科维奇和他的政府下台，因为他们将乌克兰人的欧洲梦“夺走了”。同时他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我请大家注意，假如有人要你们冲击某一做政府大楼，那会是非常危险的”，乌克兰改革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强调。他曾经是一名拳击冠军。

克里琴科警告，要避免挑衅行为，不要作出回应，虽然它声明：“我们会呆在这里，直到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米克拉-阿扎罗夫政府和总统下台，”他补充道。

几位年轻的反对党成员爬上了圣诞树的金属架，在上面插上他们的旗帜，而同时另一些人高喊‘出来，政府’或者‘圣诞树下’。据目击者称，一伙反对派人士爬上了一台挖掘机。它在向政府大楼靠近，很多人就开始包围大楼。根据流传在网上的一些视频图片，在人群试图两次打开通往政府大楼的通道后，警察已成功地从示威者手中抢下挖掘机。

“我们知道亚努科维奇不在这里，但这是一个标志，它必须是我们的，”一名示威者向乌克兰电视台表示。

另一些示威者已经打破了市政厅（距离广场约 200 米）大楼窗户玻璃，并且进入宗教法院。带着防瓦斯口罩或者医用口罩的年轻人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据社区电视台报道，这是“挑衅行为”，因为在总统大楼区域内没有反对派领袖，而且“没人下令冲击大楼”。该电视台还报道在示威者之间开始了一场采取武力行动和呼吁大家镇静的争论。

自从亚努科维奇在最后时刻决定取消同欧盟签订协议之后，整个国家就进入了躁动不安的状态。欧盟于上周四、五在维尔纽斯举办峰会。反对党已经开始准备在未来几天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阿森尼-亚森纽克表示。他是乌克兰祖国党议会团的领袖。

今天早上，总统亚努科维奇表示他将动用一切力量向欧盟靠近，但他强调同二十八国集团的合作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我将会动用我所有的力量加速向欧盟靠拢的进



程，我不允许我们的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也不会让我的国民的生活条件下降，”在庆祝脱离苏联全民公投纪念日时，总统向全国讲道。

‘我们要步利比亚的后尘吗？’

然而，在欧洲惨败后，反对党继续在首都的新舞台上组织游行，要求总统向欧盟靠拢。本周末他们的要求更高了，他们要求提前大选、政府和总统下台。

乌克兰内政部长维塔利-扎卡申克警告说，假如游行中出现混乱，警方将会回应。“混乱？警方应该回应。我们想步利比亚和突尼斯的后尘吗？如果有电话来通知混乱局面，我们将作出回应，”他向国际文传通讯社说道。

乌克兰第三共和国运动领袖、前内政部长尤里-鲁申科表示，游行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革命。“我们的计划很清楚：这不是一次集会或者行动，而是一场革命，”他讲道。

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公民社会和政治家们“正在完成 1991 年和 2004 年大游行所没有完成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分别指代脱离苏联和橙色革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天不存在了。我们正在参加它的葬礼，”他说。

乌克兰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周六通过在医院写好的一封信告诉自己的追随者，号召他们在街头“抵抗”，直到政府下台。季莫申科将在这家医院服刑 7 年。

残暴打压

三个反对党已经采取一致决定，成立一个抗压总部。他们表示从周四凌晨到周五，警察接受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命令镇压“纯朴而和平”的人，犯下了“罪行”，更恐怖的是，他们镇压“儿童”。根据内政部长维塔利-扎卡申克的说辞，警察残暴毒打儿童。媒体以及众人将自己的视频传到网上。他们用图像记录了防暴警察是如何粗暴驱逐那些留在独立广场上的年轻人。在那里，最近几天示威越来越多。

欧盟谴责乌克兰警方对那些亲欧洲的游行者采取“过度的武力”措施，并要求对事实进行调查。布鲁塞尔方面，“不合理地使用武力违背原则”，本周所有东欧伙伴关系峰会的与会国都曾重申其承诺，其中包括乌克兰领导人。本周五凌晨亚努科维奇已经宣布调查所发生的事情。但他坚持认为欧盟强加的签约条件是对乌克兰的羞辱，并且对国家经济而言将会是一场灾难。



布鲁塞尔方面对发生在乌克兰的支持与东欧签订协议并与欧盟展开自由贸易的游行，强调的是和平以及“史无前例”的特点。本周六欧盟执意要求基辅方面“完全尊重国际承诺、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尽管乌克兰占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席之位。

（来自译言网，译者 Eureka08。原文来自法新社）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2 汤中超：乌克兰政治危机凸显三重博弈


汤中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研究部研究实习员。

“此次乌克兰出现的国内大规模抗议，不仅凸显了乌国内政治累积的深刻矛盾，更折射出国际力量围绕乌克兰所展开的激烈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国家方向之争、党派权力斗争以及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乌克兰此次政治危机显得扑朔迷离、前景难料。”

在维尔纽斯“东方伙伴关系”峰会召开前夕，由于乌克兰政府突然宣布暂停欧洲一体化进程，此举引发乌国内欧洲一体化支持者的强烈抗议。连日来，乌克兰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发酵，酿造了继 2004 年乌“橙色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事件。目前，以基辅独立广场为中心的国内抗议，在形式上已演变为要求政府下台、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的反对派阵营夺权之争。

此次乌克兰出现的国内大规模抗议，不仅凸显了乌国内政治累积的深刻矛盾，更折射出国际力量围绕乌克兰所展开的激烈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国家方向之争、党派权力斗争以及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乌克兰此次政治危机显得扑朔迷离、前景难料。

国家发展方向的抉择。在乌克兰国内政治生态中，亲俄的东部地区与亲西方的西部地区长期对立已成为特有现象。在国家发展方向问题上，西部地区支持加入欧洲一体化，东部地区支持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一直以来，在涉及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面前，东西对立的国内政治生态成为亚努科维奇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

亚努科维奇政府自 2010 年上台以来，从前政府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转向全方位平衡外交政策。在国家方向选择上，加入欧洲一体化被确定为乌外交优先方向，但囿于在贸易和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严重依赖，乌不得不在欧盟与关税同盟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然而，无论关税



同盟还是欧盟，都要求乌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俄总理梅德韦杰夫明确表示，乌克兰不能“同时坐到两张椅子上”；欧盟也从法律角度强调，欧盟东部伙伴国家不可能既加入关税同盟，又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因此，夹在“欧盟和俄罗斯两个怪物之间”的乌克兰一直处在向东或向西的艰难抉择中。

2013 年维尔纽斯“东方伙伴关系”峰会将乌克兰推向了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十字路口。此前几个月，乌克兰与欧盟在签署联系国协定问题上相向而行的步伐明显加快。乌政府积极向欧盟靠拢的政治路线，无疑提高了国内欧洲一体化支持者的心理预期。但随着政府政治路线的突然调整，加强与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引发国内大规模抗议。

围绕总统宝座的运筹。乌克兰实行多党制，目前，官方登记的政党有 198 个之多，党派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从国内政治上讲，此次乌克兰政治危机很难排除争夺 2015 年总统宝座的影子。

在涉及乌克兰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面前，在维尔纽斯峰会之前一段时间，政府积极奉行加入欧盟的政治路线，此举被广泛解读为争取乌西部地区支持率。要指出的是，尽管选择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本身会迎合西部地区民众的支持，但此举对乌经济影响的消极预期，使得亚努科维奇政府不得不考虑国家经济利益受损而造成支持率的整体下降。

从反对派阵营整体实力来看，前总理季莫申科最可能成为亚努科维奇 2015 年捍卫总统宝座的真正对手。欧盟方面坚持认为乌当局对其的判决存在政治动因，释放季莫申科成为欧盟同意与乌签署准成员国协定的关键条件。不难看出，在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问题上，季莫申科因素不仅是司法问题，更是一场涉及 2015 年乌克兰总统大选的运筹与博弈。

地缘政治争夺。自后冷战时期以来，乌克兰日趋成为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战略必争之地。如果说 2004 年乌“橙色革命”暗藏着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较量，那么此次乌克兰政治危机也不例外。

从欧洲方面看，随着欧盟最后一次东扩的完成，其东方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2009 年，欧盟正式启动了取代欧洲邻国政策的“东方伙伴关系”，对象国涵盖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欧盟与东方伙伴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为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但乌政府在峰会前突然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做法使其黯然失色。



在俄罗斯，欧盟“东方伙伴关系”政策一向被视为美欧对俄地缘战略的进一步挤压，对此十分警惕。当前，在普京试图构建欧亚联盟的大背景下，拉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成为俄地缘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在对乌政策上，鉴于俄乌传统上形成的紧密经济联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能源依赖，俄不断以贸易和能源为杠杆掣肘乌克兰，以阻止乌加入欧洲一体化。俄罗斯与美欧展开的地缘政治争夺，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乌国内局势更加难以预料。

目前，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仍在持续。在维尔纽斯“东方伙伴关系”峰会之后乌克兰又一次完成了外交上的东西“再平衡”，在缓和来自俄罗斯方面压力的同时，并没有关闭欧洲一体化的窗口。但是，乌国内政治生态却在不断恶化，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能否应付复杂形势下的诸多问题，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原载于《瞭望》新闻周刊，2013 年第 51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外┫

9-3 伊万•克拉斯特夫：谁丢掉了乌克兰？



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保加利亚政治学者、索菲亚自由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

外人需要明白筹码在后苏联空间里最近已经变得多么高了，两个针锋相对的融合计划注定要发生冲突。乌克兰现在只剩下三个选择：与欧盟签署协议，这是多数乌克兰人的渴望；加入普京的欧亚联盟，这是陷入危险中的政治精英的渴望；或者陷入破产崩溃的境地。

”

几乎一夜之间，乌克兰不再是“中央王国”了。伊万·克拉斯特夫认为，现在只剩下三个选择：与欧盟签署协议，这是多数乌克兰人的渴望；加入普京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这是处于危险中的政治精英的渴望；或者陷入分裂崩溃的境地。

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迹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令人悲哀的是，在乌克兰，悲剧和喜剧已经分不清了。

这就是为什么把政府拒绝签署加入欧盟的协议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浪潮解读为第二次橙色革命是错误的了。在 2004 年，受到尽快加入欧盟的希望的激励，乌克兰人涌上街头决心要拿回被窃取的总统大选结果。当时，欧盟看起来像一个能够把专制国家一下变成民主国家，能让贫穷的社会一下子富裕起来的幻想机器。而这次促使乌克兰人走上街头的原因不同，他们要表达的是一种恐惧，即该国加入欧盟的希望可能永远地消失了。他们知道乌



克兰在接下来十年不大可能加入欧盟，他们也知道欧盟本身也陷入危机，但他们决心坚持争取获得拥有欧洲未来的权利。在欧盟东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时刻，对丧失这种希望所感动的恐惧似乎是欧盟软实力的核心。

反映在当今抗议浪潮中的橙色革命的真正遗产是人们当时认识到政治领袖是靠不住的，聚集在基辅独立广场的数万人可以表达有效的否决权。2004 年和今天的最大区别是乌克兰似乎一夜之间已经失掉了地缘政治模糊性的特权地位。

在后冷战的二十年里，乌克兰一直就像一个大号的公文包，却没有把手。你既不能随身携带又没有办法留在车站上。人们认定乌克兰陷入分裂，一边是亲俄罗斯的东部，一边是反俄罗斯的西部，任何激进的动作都可能导致国家陷入分裂。

乌克兰的经济依靠俄罗斯和欧盟；乌克兰外出打工者既往东方跑也往西方跑；掌权的寡头集团并不傻，他们也知道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政治上说，乌克兰有自己的世界：腐败、混乱、效率低下，但是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更开放，更有多元文化色彩。虽然总是很难了解乌克兰领导人到底想要做什么，但是我们能很容易地预测他们到底能走多远。并不令人奇怪的是，乌克兰精英花费了 20 年的时间做出各种承诺，但是总想方设法回避兑现这些承诺。

但是，所有这些似乎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乌克兰不再是“中央王国”了。无论俄罗斯还是欧盟都再也无法忍受现状了。前者决心要重新将前苏联国家组合起来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后者则对亚努科维奇总统拒绝签署加入欧盟的协议而感到受辱。现在的危机表明欧盟低估了它的欧洲睦邻友好政策的巨大威力，这让人意识到欧盟的政治吸引力的巨大力量和欧盟外交政策的软弱性。

说到底，人们都误解了乌克兰。欧洲政客让克里姆林宫相信乌克兰对欧盟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结果，俄罗斯想不仅切断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退路，而且要拉拢这个国家加入自己的融合项目。欧洲领导人也忽略了俄国领袖对欧洲的文化蔑视，欧盟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同性恋婚姻的帝国”。

俄罗斯也误解了乌克兰。基辅抗议的庞大规模令克里姆林宫感到心惊，因为俄罗斯精英从来没有认为公民社会成为国家政治中的独立力量，也没有注意到乌克兰社会中欧洲人身份共识的出现。不过，普京的算计是正确的，与九年前不同，亚努科维奇总统可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如果这是他确保抓住政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



外人需要明白筹码在后苏联空间里最近已经变得多么高了，两个针锋相对的融合计划注定要发生冲突。乌克兰现在只剩下三个选择：与欧盟签署协议，这是多数乌克兰人的渴望；加入普京的欧亚联盟，这是陷入危险中的政治精英的渴望；或者陷入破产崩溃的境地。

（译自：Who lost Ukraine? By Ivan Krastev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3-12-13-krastev-en.html 吴万伟 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4 刘凯、方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谈俄罗斯的乌克兰情结

刘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方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独立在俄罗斯人看来是一个“天大的悲剧”，极大地触动了俄罗斯国内民众的乌克兰情结。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乌克兰敏感的地缘政治地位，并且由于乌克兰的独立，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遭受重大挫折。因此，为了拉住乌克兰，俄罗斯逐渐形成了对乌克兰的政策选择。

”

内容摘要：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独立在俄罗斯人看来是一个“天大的悲剧”，极大地触动了俄罗斯国内民众的乌克兰情结。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乌克兰敏感的地缘政治地位，并且由于乌克兰的独立，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遭受重大挫折。因此，为了拉住乌克兰，俄罗斯逐渐形成了对乌克兰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乌克兰 地缘政治 俄罗斯

1991 年 8 月 24 日，乌克兰议会发表国家独立宣言，从而结束了和俄罗斯长达 300 多年的合并历史[①]，成为了独立国家。同年 12 月 18 日，乌同俄罗斯、白俄罗斯签署成立独联体的《别洛韦日协议》随后前苏联正式解体。乌克兰的独立标志着乌俄关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一个国度内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两个独立国家间的关系，但是两个民族在几百年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各种联系并不会因为两个民族的各自独立而终止，俄罗斯的乌克兰情结和乌克兰日益凸显的地缘战略地位影响着两国各自的对外战略选择。本文着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乌克兰独特的战略地位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



一、俄罗斯的乌克兰情结

俄罗斯的乌克兰情结包含着这样的一些因素，即乌俄两个民族曾经共处于同一个国度，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有着地缘、经济、文化以及亲情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一直把乌克兰看作是“小兄弟”。乌总人口中有 22%共计 1150 万的俄罗斯族人。虽然俄语目前不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在乌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却只讲俄语，在大城市的社交场合多以讲俄语为荣，俄罗斯人甚至把乌克兰语看作是俄语的一种方言。几乎每个乌克兰人都或许与俄罗斯的机构、个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乌俄两个民族在历史上难分难舍，也积下了数不清的恩恩怨怨。但是，俄罗斯的乌克兰情结在乌国内并不受欢迎，被视为是俄罗斯大一统的神话和俄的帝国心理在作祟，是乌俄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最大障碍。这是因为乌克兰认为在乌俄两个民族近 300 年的交往中，乌克兰从来就被当作“小俄罗斯”，其自身的民族特性长期被俄罗斯“一切都要统一”的帝国性压制，民族意愿往往被忽视，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迫或人为的为大俄罗斯主义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比如在彼得大帝时期乌克兰哥萨克被强制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去同北方的瑞典作战；18 世纪的俄土战争、19 世纪的反法同盟和克里米亚战争以及 20 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总有许多乌克兰人冲锋陷阵；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的苏俄政府为换取工业建设所需的外汇、30 年代初为推行集体农庄的强制迁移而两次造成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的大饥荒[②]；80 年代发生在乌克兰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生态污染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等等。这些痛苦的经历不仅加重了乌的人员伤亡和国民经济的危机，而且更重要的是给乌克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对于乌克兰的独立，俄罗斯国内相当多的具有乌克兰情结的人，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家,都很难承认乌克兰已经脱离出俄罗斯这样一个事实.乌克兰的独立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天大的悲剧”。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乌克兰既不同于波罗的海三国，也不同于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其他原苏联的后继国，乌克兰只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乌的民族自性长期受到怀疑。俄自由派哲学家别林斯基甚至认为，乌克兰人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只有一个总的俄罗斯民族[③]。据 1991 年的《莫斯科新闻》报道，数百万俄罗斯人都认为,离开乌克兰就无法谈及伟大的俄国,更无法谈及任何形式的俄国。俄自由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兹甫科的结论是:“没有今天的乌克兰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俄国。”维克多·阿克苏齐兹,这位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提出:“即使处于今天这种情况,我仍然完全相信,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今天仍同属于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这个民族是建立于东正教



信仰基础上的共同历史形成的.[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我遇见过众多俄罗斯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乌克兰能够独立”。乌总统库奇马也承认,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可以给乌主权,但不给乌“独立”。乌现在及今后仍将是俄的势力范围。[⑤]就连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样忠实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希望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能重新组成一个俄国,而这个“俄国”仍包括乌克兰。直到今天,大部分俄罗斯人,包括政界、军界和文化界,仍然把乌克兰人视为完整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乌克兰的独立极大地触动了俄罗斯的乌克兰情结。

俄乌关系中会出现这种看起来令人费解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以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二、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及其对外政策选择

独立后的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原苏联欧洲部分的西南部，是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大的邻国，其东北部和东部与俄罗斯接壤，北接白俄罗斯，西与波兰、斯洛伐克毗邻，西南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相接，西南隔黑海、亚速海与土耳其相望。乌克兰的领土面积为 60.37 万平方公里，人口 5200 多万，在独联体国家中，乌克兰的综合国力仅次于俄罗斯。

乌克兰从 14 世纪开始一直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历经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苏联时期，只有一战之后有一段非常短暂的独立时间，即从 1917 年到 1922 年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因此，几百年来与不同统治国家的联系导致乌克兰经济、社会和种族结构的发展十分复杂，例如乌克兰的东、南和中部地区 18 世纪以来一直被俄罗斯统治，西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原来属于奥匈帝国，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属于波兰和匈牙利[⑥]。这种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对乌克兰内部的稳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严重影响着乌克兰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甚至不少乌克兰人怀疑自己国家的特性，怀疑成立独立国家的正当性和持久性[⑦]。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乌克兰的特殊性还在于，作为边缘国家和夹缝国家的乌克兰历史

上总是战争的舞台，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这里上演了无数的战斗[⑧]。在许多情况下乌克兰的政治命运总是任人宰割，乌的民族利益也总是受到不同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或者难以实现，或者是民族安全受到伤害，即使是乌的内政也常和别的国家搅和在一起，比如乌克兰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的俄罗斯化的程度在中东欧国家中就是比较少见的。尽管乌国内



的民族精英常常把国家独立的梦想与归属西方文化的意识和向西方开放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却无法不顾忌俄罗斯的反应，乌克兰政治学者称之为乌克兰地缘政治悖论，或者叫乌克兰的“安全综合症”[⑨]。在冷战时期，乌克兰是苏联的西南门户和通往欧洲的战略通道，也是苏联的陆上堡垒和对付北约的战略前沿。乌的政治体系、经济发展战略和苏联融为一体，前苏联也有意识地对乌进行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上的教化，更加淡化了乌的民族和国家特性。作为前苏联领土的一部分，乌克兰只能起到地缘战略棋子的作用，而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欧亚大陆的大棋局中发挥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欧洲与独联体的地理交叉点上，是欧洲唯一一个地处独联体、西亚和中东欧三大集团接合部的国家。从构建新的欧洲安全体系的角度来观察乌克兰的地缘战略形势，可以明显地看到，乌介于东方的俄罗斯、西方的北约和欧盟、南方伊斯兰影响较大的中亚和土耳其之间，乌克兰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选择对于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和独联体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整个欧洲地区的力量对比，其影响甚至会波及到巴尔干和中亚地区的安全。基于其对于东西方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在过渡时期乌克兰的对外政策面临三种选择：

一是逐步向北约和欧盟靠拢，争取尽快入约加盟。即依靠欧洲和北约的支持确保自身的独立和安全，从而导致独联体内部地缘政治多元化，成为西方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地缘战略前沿，甚至走向俄罗斯的对立面。毫无疑问，这对乌实现与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和国家安全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但是这样一个决定将会使乌成为欧洲新的边界，或许会更加加剧这个地区的安全局势，从而导致北约和俄罗斯的直接冲突。一方面由于乌与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倒向西方不仅会产生内政混乱，而且会危及这个年轻国家本来就不是很牢固的国家自性，国家一统会动摇；另一方面，从西方的角度看，这种在目前就拉乌加盟入约考虑也不现实，北约和欧盟在发展与乌的关系时不得不考虑俄罗斯的反应，由于担心因此直接引发该地区潜在的冲突，西方不愿也不敢走得太快。因此乌和北约的关系目前定位在“特殊的和平伙伴关系”，欧盟与乌克兰签署合作伙伴关系虽然早与俄半年，但实际生效却晚与俄 4 个月，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乌与北约和欧盟的关系也可以被看作是地缘政治的悖论，不仅对乌而言，而且对西方而言都是如此，欧盟看重的是乌的内政，北约看重的是乌的外交。双方最终权衡的结果决定乌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还是成为欧洲灰色地带的一部分。



二是与俄建立密切的军事联系并在后苏联安全架构的框架内与独联体国家一体化。即通过加强独联体、从而使独联体成为俄罗斯走向世界强国的战略基地的方式，实现与俄罗斯的休戚相关，并同时增加自己在独联体内的权重。这种选择无疑有很大的可能性，也会对乌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的社会转型只能以俄罗斯为榜样，重复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最终导致放弃乌刚刚觉醒的民族自性和国家独立。对于西方而言，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边界，必然会限制乌经济与欧洲市场的融合。因此这种选择在目前的条件下似乎也不现实，它取决于乌内部力量对比的改变和乌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

三是奉行不结盟和中立的对外政策。乌在当初的独立宣言中明确表达了其国家安全政策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保证不再拥有核武器，在国际监督和援助下或销毁或转移其境内核武器及运载导弹；第二，保证成为不结盟国家，不谋求成为北约成员。前者显然是为了取悦西方，后者是为了博得俄罗斯的信任。但是这种选择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影响出现了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乌希望的效果。西方借口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缓慢，对乌的经济援助常是口惠而实不至，在支持乌摆脱对俄的依赖上也常常虚情假意；而俄罗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断侵犯乌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乌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普遍认为，独立之初确立的这种国策严重损害了乌的国家安全利益，1996 年 6 月乌议会对此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一种意见主张加快与北约和欧盟的一体化，另一种意见主张未来应密切与俄领导下的独联体的安全和经济联系。经过争论通过的新宪法宣布，中立政策只是作为宪法总纲的一个声明。

其实奉行安全中立的政策对于像处在地缘政治夹缝中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典型的选择，一方面可以增强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可以扩大活动空间。应该说这也是介于东方俄罗斯和西方北约均衡关系中的乌克兰独立当初的无奈之举和明智之为，这种选择也折射了乌克兰矛盾、摇摆和实用主义的心态和做法。面对来自东西方的压力和诱惑乌常常表现得自相矛盾和举棋不定，乌克兰独立后一度把防范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寻求西方国家的合作与支持，确保国家主权独立与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战略取向，但是当俄罗斯表现出不满时，乌又强调，俄是乌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曾多次强调，俄罗斯是乌克兰“最值得信赖的永远的伙伴”。乌外交上的不确定性使得西方国家对它半信半疑[⑩]。在对待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上，乌也是出尔反尔，独立之初乌向俄作出保证不加入北约的承诺。而 1994 年库奇马就任总统以后就提出，与欧洲机构接轨和深化跨越大西洋的合作是乌克兰的优先选择和战略目标。乌克兰于 1994 年 2 月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



系计划”，1997 年，双方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宪章”。2001 年 2 月库奇马访俄接受俄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却表示，乌从未打算也不准备加入北约，巩固对俄伙伴关系是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2001 年乌独立 10 周年日纪念大会上，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库奇马又说，同欧洲实现一体化是乌克兰独立后第二个 10 年的主要战略目标。2002 年 5 月，乌克兰正式宣布要求加入北约。在乌看来，其民族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俄罗斯，俄罗斯扮演者朋友和敌人的双重角色。乌认为北约才是欧洲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乌不反对北约东扩，不把其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而是看作冷战后西方军事联盟在新的安全条件下在结构和功能上调整的重要步骤。

对于乌奉行的这种“不东不西”，或者说“偏西”的中立政策，人们可以理解为处于地缘政治地位十分微妙的乌克兰基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现实考虑，也可以理解为乌迫于俄罗斯的压力的无奈之举。但乌这样做更多的以此谋取在与东西方的交往中获取更大的好处，如是则不难理解，库奇马在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的当天签署关于按照欧盟标准修改乌克兰立法的重头法案，而同一天乌国防部长马尔丘克也在北约总部出席乌克兰－北约军事改革高级工作小组会议。今后处在夹缝中的乌克兰能否在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中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不仅取决于俄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乌的独立自主，而且还要看西方的眼色，即按照北约和欧盟的标准改造自己，更重要的在于乌能否用自己的腿走路。为此乌最近将奉行的“中立政策”改为：第一，坚决保持随时开发、生产核武器的潜力；第二，放弃不结盟政策，坚决向北约倾斜，成为北约的合作伙伴国，一旦时机成熟，毫不犹豫地加入北约。

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的安全形势长时间被忽视了，西方认为这个年轻国家自动解除核武更多的是为了谋求经济援助，当人们向东方看时，多是关注内外交困的俄罗斯，乌的问题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或者得不到西方真诚有力的支持，或者只是在短时间内引起西方的注意。随着北约东扩的不断推进，人们开始意识到幅员辽阔、拥有强大军事潜力的乌克兰在未来重构的欧洲安全结构中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能取代乌的意义。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作为欧洲国家的乌克兰未来如果可以成为欧洲体系的一员，可以使北约和欧盟的影响扩展到独联体，利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地位，使乌克兰成为欧洲稳定，安全和发展的有利的地缘政治因素。在特殊情况下，乌克兰还可以作为地缘战略缓冲器，把来自东方的威胁隔离开来。对俄罗斯来说，因为乌克兰是独联体内实力仅次于俄罗斯的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因而其独立后对外战略的取向关乎俄罗斯重大的地缘战略



利益。对乌克兰来说，要想在东西方的夹缝中生存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用条约的形式锁定与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

总之，乌克兰的独立大大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直接影响着冷战后东西方地缘战略利益的平衡，并将影响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正如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所说："乌克兰处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心，有一个欧洲大国的份量。"[11] 鉴于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传统，乌尽管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首先是一个欧洲国家，客观上理应成为欧洲共同社会中平等的一员。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经济和科技潜力对于欧洲地区政治经济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实说明，现在如果不考虑乌克兰在欧洲地缘政治空间的地位和作用，则无法谈起欧洲的安全。还有就是西方国家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在欧洲东部构建一个持续稳定的安全结构，既不是鼓励乌与俄的对立，也不是孤立俄罗斯，而是促使这两个国家和西方按照北约防务联盟意义上或者在欧洲共同安全基础上的联合，唯此才能避免可能的冲突，实现持久的和平。

三、乌克兰独立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影响

乌克兰的独立给俄罗斯造成了地缘战略上的巨大损失，不仅使俄罗斯丧失了大片陆地领土，还导致西部边界线的大幅度东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半的黑海海岸线和大部分优良的港口。经过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多次的讨价还价，黑海舰队被一分为二，并且俄罗斯花费 100 多年时间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的战略要地克里米亚也失去了，[12]从而使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为争得出海口和对黑海控制权的战争成果几乎化为乌有。

乌克兰的独立，还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一大块潜在的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方面同俄国人极为接近的 5200 多万人。乌克兰的黑土地土壤肥沃，自然条件优越，谷物产量占苏联总产量的 20%，有"欧洲粮仓"之称。乌克兰的工业门类齐全，工业基础雄厚，见长于煤炭业、钢铁业、化工业、航空工业和船舶制造业，其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约占苏联国防潜力的 30%，并能生产先进的洲际导弹和军用船舶。5200 万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人，在一个国度中生活了长达 300 年，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相近的语言文化，相似的风俗习惯。两个民族共同度过了俄罗斯历史的风风雨雨，谱写了俄罗斯的光辉历史。[13]所有的这些本来可以是使俄国成为庞大而自信的帝国必不可少的资本，而现在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



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更加亚洲化。[14]

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使俄罗斯西部边界萎缩了上千公里，失去了最具欧洲特性的部分，也使得俄罗斯与欧洲的最为直接的联系通道受阻，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重心相对东移，这导致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地位趋于边缘化，其欧洲特性不免淡化，欧亚大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下滑，因而要想起到历史上独特的欧亚大国地位的作用将变得更加困难。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基辅罗斯”的失去，使俄罗斯不得不对自己国家的源头，地缘政治和民族文化的特性重新进行思考。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在外交战略上之所以首先选择“回归欧洲”，就是认为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源同根，同属一种文明，而这一点同时也是欧盟东扩过程中选择吸收对象的一个无形的标准。因此，这种潜在的影响更大并且想要改变的可能性更小。

最后，与乌克兰的独立相伴而来摆在俄罗斯面前的一个严峻的地缘政治现实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乌克兰的争夺。冷战结束后，在欧洲新的地缘政治中出现了布热津斯基所谓的“黑洞”，为了填补权力真空，防止欧亚大陆中心出现混乱和俄罗斯控制中东欧国家的野心复燃，北约通过东扩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和分化瓦解俄的势力范围。通过首轮东扩，北约已经将三个主要中东欧国家（波匈捷）置于控制之下，俄因此丧失了700～900 公里的战略纵深。2004 年的第二轮东扩又吸纳了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的 7 个中东欧国家，俄西北边境失去了所有缓冲地带。用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的话讲，北约东扩“从军事政治意义上看，是从西北方向和黑海方向包围俄罗斯”。紧接着的第三轮东扩就是要向独联体国家进军，由于乌克兰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北约把乌克兰作为指向独联体的首要目标。在美国的推动下，乌克兰已经在独联体中率先成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国，并同北约签订了《北约——乌克兰特殊伙伴国关系宪章》。2000 年 6 月美乌举行了具有针对俄罗斯色彩的代号为“合作伙伴－2000”的海上联合演习。2000 年 12 月，美国国防部又在公布的《21 世纪的美国战略》的报告中强调：“在安全领域，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帮助乌克兰改造其军队，以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多地与北约和其他伙伴国有效协作，“这些改革包括文官对军队控制的制度化”。[15]这表明美国已经开始按照北约的标准对乌克兰的军队进行改造，为拉乌“入约”作前期的准备。2004 年 3 月，乌议会赋予北约军队快速进入乌领土的权利，更是让俄当局隐约感到某种忧虑。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战略重点历来在欧洲，欧洲是俄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其未来发展与复兴的主要战略空间。而北约东扩使俄国家安全战略面临考验，双方真正形成了“零距离”接触，俄向欧洲发展的战略咽喉被卡住了，俄切实感到了直接的威胁。2004 年 4 月 1 日提前出版的一期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发表文章说，俄罗斯被北约紧紧包围，北约东扩大大改变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因为加入的不仅有前华约国家，还有前苏联的共和国。这一新形势直接牵涉到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和安全。俄罗斯新任外谢尔盖·拉夫罗夫日前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想要什么？》的文章，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前苏联国家是她的重大利益所在，这是由前苏联历史所决定的。

对于乌克兰独立对俄罗斯地缘战略地位的影响，布热津斯基更是在理论上做出了独到的分析，认为独立的乌克兰作为欧亚棋盘上的一个新的地带，起着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它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决定着俄罗斯能否再度崛起成为帝国以及是一个欧亚帝国还是一个亚洲帝国的问题。[16]布热津斯基还认为，乌克兰的稳固独立是后苏联多元化最具决定性，最实在的表现，俄罗斯能否确保乌克兰的独立和安全是决定俄罗斯选择成为一个欧洲民族国家还是想要再度成为帝国的试金石。[17]

四、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的选择与走向

在乌克兰独立伊始，俄罗斯也没有意识到乌克兰地缘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为加快“回归欧洲”的步子，一方面把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作包袱甩出去，轻装前进；另一方面，还处于对西方的一厢情愿中，而对美等西方国家继续抑俄，弱俄，挤压俄的地缘战略空间的图谋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在处理俄乌关系上，一直持强硬立场，在分割黑海舰队、继承前苏联遗产和债务分担、克里米亚归属以及乌克兰核武器等问题上，与乌克兰斤斤计较，龃龉不断，以至分歧难以弥合。另外，当时的俄罗斯仍然推行“大俄罗斯主义”，轻视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利益，致使乌克兰对俄罗斯深存戒心，谋求尽早摆脱俄罗斯的控制。总之，诸多因素导致两国独立之初互不信任，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8]2003 年，双方关系又因俄在刻赤海峡朝乌方的图兹拉岛方向修建堤坝而骤然紧张，直接酿成了 10 年来两国之间最严重的危机，虽然两国总统去年底签署了共同利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条约，成功化解了两国边界危机，但乌俄划界工作中的其他一些棘手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东扩进程的深入，乌克兰成了俄罗斯阻隔来自西方地缘政治压力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利用俄罗斯实力衰弱和独联体离心倾向增强的有利时机，软硬兼施，



积极拉拢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内的欧洲国家，以及外高加索地区的独联体国家，并通过阿富汗战争渗透到中亚地区，以期从西、南两个方向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至此，俄罗斯才对乌克兰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在叶利钦执政后期开始调整对乌政策，努力改善与乌克兰的关系。1999 年 2 月 17 日，俄联邦委员会批准《乌俄友好、合作与伙伴关系条约》；6 月 16 日，俄杜马批准了俄乌关于分割黑海舰队的三个协议，6 月 25 日，俄联邦委员会批准了俄乌关于分割黑海舰队的三个协议；7 月 1 日，库奇马总统在参加萨尔斯堡中东欧国家经济论坛时会见了俄总理斯捷帕申斯重申俄政府发展对乌合作的坚定意愿，并表示，俄乌过去是，将来也将永远是伙伴，俄乌关系是特殊关系，两国正在脱离“大哥”与“小弟”的概念；9 月 21 日，俄海军与乌在黑海举行“和平航线—99”水陆联合军事演习；10 月 9 日，俄外长伊万诺夫对乌进行工作访问，向库转交了叶利钦总统的亲笔信，信中重申了俄愿与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在普京出任俄罗斯新的总统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始推行务实主义外交。俄罗斯一方面改变了过去大国主义姿态，强调两国过去的友好传统，积极与乌在一系列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上进行平等磋商，解决了不少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经济的依赖性，软硬兼施，拉住乌克兰，遏制其西倾趋势。因为乌克兰 80%的能源靠俄罗斯提供，40%以上的商品销往俄罗斯，47.5%的易货贸易与俄罗斯进行，并且这种格局在近期内难以打破，[19]所以这就使俄罗斯能够通过对乌克兰施加经济影响而达到政治影响的目的。因此，普京上台后，在首访乌克兰时首先解决的就是乌克兰对俄迫切需要的对乌石油供应问题以及乌对俄的债务拖欠重组问题。2000 年 3 月 16 日，俄同乌克兰签署了关于俄黑海舰队在乌驻留具体问题的 7 个协议；同年 8 月 24 日，普京向乌总统库奇马祝贺乌国庆，普京称，相信两国人民发展紧密一体化的愿望将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开展积极的和富有成果的合作；8 月 21－26 日，俄还与乌克兰等七个独联体国家在俄的阿斯特拉罕州举行名为“战斗联合体 2000”的独联体防空部队联合军事演习；另外，俄罗斯还利用乌美关系黯淡，库奇马竞选连任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政治压力的时机，邀请库到俄访问并给以超规格待遇，随后还就统一电网同乌签署新的协议以解乌的燃眉之急。2001 年 8 月普京在出席乌克兰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式期间强调，“今天的俄乌关系是稳定的，可预见的。这种稳定的伙伴关系不仅对两国人民，而且对整个独联体，对统一的欧洲和世界都是一个良好的征兆。”[20]2001 年 12 月，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全俄乌克兰移民大会代表时又重申，俄乌关系一定要有所突破，同时宣布 2002 年为“乌克兰年”。2003 年 2 月 23



日俄又与乌、白、哈四个独联体国家就成立统一经济区开始谈判，并于 9 月建立了包括摩尔多瓦在内的“独联体自由投资贸易区”；2003 年 5 月俄乌在基辅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为加强两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4 年新年伊始普京就出访乌克兰并强调，俄罗斯需要强大的乌克兰，俄乌两国能够并且必须成为忠实的盟友和可靠的战略伙伴。俄新任外长拉夫罗夫在最近访乌时，更是把乌克兰提升到“俄未来在欧洲及全球战略中最亲密的合作伙伴”的地位。这些举措都使乌克兰感受到了来自俄的政治与经济的巨大亲合力，从而使得乌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俄总统普京在 2003 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对俄罗斯而言，“对独联体国家的合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绝对优先方向”。实际上，苏联解体后，俄始终视独联体为其“特殊利益区”和“传统势力范围”，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自然成为俄对外政策的首要选择。俄希望把独联体打造成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使其成为抗衡美国和北约的可靠屏障。因此对在独联体内占有首要地位而又左右摇摆的乌克兰，俄罗斯下一步会加大实用主义的外交力度，利用地缘上俄乌毗邻、经济上乌严重依赖俄、政治上乌国内有着强大的亲俄势力和文化上俄乌相似等有利条件，恩威并重，遏制其西靠势头，加强其与独联体联系的纽带，维护俄罗斯的利益。

俄对乌政策选择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确保乌克兰留在独联体内，至少确保乌克兰对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谋求势力范围不构成障碍；把乌克兰纳入俄罗斯的安全范围，确保自己的西南门户；确保对黑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使乌克兰黑海沿岸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成为俄罗斯实际上的军事战略基地；利用乌克兰国内俄罗斯人的亲俄情绪，牵制乌的离心倾向；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防止北约把边界扩展到家门口。俄罗斯的对乌政策选择和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充分体现了乌克兰地缘位置的敏感性和俄罗斯对乌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视，拥有乌克兰，俄在对付西方方面就多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俄就容易确立在独联体内的盟主地位和实现欧洲大国的梦想，反之，乌克兰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向俄罗斯渗透影响的跳板和新的桥头堡，并被用来抑制俄罗斯大国主义的重新崛起。

需要注意的是，俄的对乌政策选择和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脆弱性。一是俄的对乌政策可能引起西方国家的猜疑，前面讲到维护乌克兰的稳固独立是后苏联多元化最具决定性，最实在的表现，是北约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过于亲密的俄乌关系自然会引起西方国家对俄重新控制乌克兰的担心并采取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从而对俄罗斯的对乌战略目标造成损害。二是俄的不明智的对乌政策可能引发乌固有的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



特别是当乌克兰感觉到俄正以某种方式吞并乌时，乌克兰无疑会加快投入西方怀抱的步伐以寻求安全保护，而不会继续实行目前的在俄与西方国家之间保持一定平衡的外交政策，从而也会损害俄的对乌战略目标。所以，俄罗斯的对乌政策和对乌战略目标选择在今后不同的时期应会通过灵活的调整，在俄、乌和西方国家之间保持一定的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普京务实主义外交的效用。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乌克兰情结主要在于乌克兰地缘战略地位对于俄罗斯的极其重要性。

冷战前及冷战时期，乌克兰是沙皇俄国和原苏联向中东欧施加影响，插手欧洲事务，同西方相抗衡的地缘政治堡垒与前沿；后冷战时期，乌克兰又成为一枚决定俄罗斯能否树立在独联体的盟主地位，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的重要的地缘政治棋子。

唯其重要，所以难舍，这才是俄罗斯乌克兰情结的实质。

［①］15 世纪时，乌克兰民族大体形成。1654 年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与俄罗斯沙皇签订《彼列亚罗斯拉夫和约》，东乌克兰与俄罗斯正式合并。18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乌克兰西部地区也被并入俄罗斯。1917 年 12 月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2 年 12 月 30 日加入苏联。

［②］Raine Lindner:Der“Genozid”im kulturellen Gedaechtnis der Ukraine und Weissrussland.Vernichtungstraumata in Sowjetischer und nachsowjetischer Zeit,in:Forum fuer osteuropaeische Ideen-und Zeitgeschichte,7,Jahrgang 2003,Heft 1,SS.113,116.

［③］Torbakow,Igor,Die Zukunft wird beweisen,wer Recht hat,in:Nesawissimaja Gaseta,Moskau,21.4.1995,S.3.

［④］(加)冉诺•科古特：《俄罗斯大一统的神话和俄乌关系》，严文华译，原载《欧洲》，1996 年第 3 期，第 86 页。

［⑤］姜长斌，孙景民：《夹缝与支轴——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环境与选择》，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43 页。



[⑥] Guido Hausmann,Andreas Kappeler,Ukraine:Gegenwart und Geschichte eines neuen Staates,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1993,S.13.

[⑦] Manfred Schuenemann,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Zwischenlage der Ukraine—Chance und Risiken,in:Siegfried Bock,Manfred Schuenemann,Die Ukraine in der europaeischen Sicherheitsarchitektur,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1997,S.14.

[⑧] 17 世纪以来发生在乌克兰领土上规模比较大的战争就有：1648-1667 年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和莫斯科公国之间的战争，1700-1721 年俄瑞北方战争，18 和 19 世纪的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20 世纪 20 年代苏俄的国内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参见：Andreas Kappeler,Vom Grenzland zur Eigenstaatlichkeit:Historische Vorausetzungen von Staat und Nation,in:Juliane Besters-Dilger,Die Ukraine in Europa,Akuelle Lage,Hintergruende und Perspektiven,Boehlau Verlag Wien.Koeln.Weimar,2003,S18-19.

[⑨] Wododimir Krishanowski,Die Ukraine und Europa—sicherheitspolitische Positionen aus ukrainischer Sicht,in: Siegfried Bock,Manfred Schuenemann,Die Ukraine in der europaeischen Sicherheitsarchitektur,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1997,S.34.

[⑩] James Sherr,Eine Gescheiterte Partnerschaft?Die Ukraine und der Westen,in:Gehard Simon,Die neue Ukraine,Gesellschaft-Wirtschaft-Politik(1991-2001),Boehlau Verlag Koeln.Weimar.Wien,2002,S.321-322.

[11]（俄）《独立报》，1994 年 6 月 21 日。

[12] 陆齐华著：《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

[13] 顾志红著：《非常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 页。

[14]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1－122 页。



［15］赵鸣文：《俄美对乌克兰争夺态势》，原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 年第 6 期，第 12 页。

［16］（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2 页。

［17］（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北约与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关系》，原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 年第 10 期。

［18］赵鸣文：《俄美对乌克兰争夺态势》，原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 年第 6 期，第 13 页。

［19］（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6 页。

［20］参见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 2001 年 8 月 24 日电，《普京基辅谈俄乌关系》。

（中评网首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内┫

9-5 奥莱尔•科茨乌巴：乌克兰人为自由价值观而战


奥莱尔•科茨乌巴(Oleh Kotsyuba)，哈佛大学斯拉夫语和文学博士研究生，乌克兰知识分子期刊《批判》(krytyka)网络版编辑。

“

抗议者中有的呼吁总统辞职、弹劾总统和重新进行选举。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一系列价值观上对欧洲的认同，这些价值观会消除腐败，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公平的薪酬、稳定的货币，以及一个能提供可靠服务且尊重公民的、负责任的政府。对他们而言，这些甚至比加入欧盟带来的切实利益——比如在其他欧洲国家工作的权利和欧洲国家在乌克兰进行大手笔投资的可能性——更有价值。

”

11 月 21 日，在一个名叫穆斯塔法・纳耶姆(Mustafa Nayem)的记者 Facebook 号召下，1500 多名乌克兰人来到基辅的独立广场，抗议政府“暂停”筹备同欧盟签署联合协议的决定。第二天，更多人群聚集在基辅和其他一些城市。很快，抗议者超过了 10 万人。

本月是“橙色革命”的九周年。当年的革命迫使当局取消了一场颇受争议的总统决选的结果，并进行重新投票。但近 10 年来，乌克兰人基本上对政治漠不关心，在这样一个国家



里，没人预料到这一决定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而且这个决定甚至无法保证乌克兰会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将来都未必。

政府反对签署该协议的理由似乎很合理：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加入一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关税同盟，而乌克兰则不敢冒失去俄罗斯市场这个风险。如果乌克兰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失去俄罗斯市场这一幕必然会出现。

然而，乌克兰人尽管很穷也很犬儒主义，但他们却在意这个协议。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曾让人们看到了乌克兰融入欧盟的希望。若要加入欧盟并与之组成自由贸易区，乌克兰需要做出改变以满足一些必要条件，为此议会已经通过了多项议案。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乌克兰人，甚至在最倾向于俄罗斯的东部，都支持入欧。

周五，为期两天的立陶宛维尔纽斯峰会闭幕，正式宣告了这些希望的破灭，令人们大为沮丧。

抗议者中有的呼吁总统辞职、弹劾总统和重新进行选举。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一系列价值观上对欧洲的认同，这些价值观会消除腐败，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公平的薪酬、稳定的货币，以及一个能提供可靠服务且尊重公民的、负责任的政府。对他们而言，这些甚至比加入欧盟带来的切实利益——比如在其他欧洲国家工作的权利和欧洲国家在乌克兰进行大手笔投资的可能性——更有价值。

今天进行抗议的这些 20 岁至 40 岁不等的人们是第一代完全摆脱了冷战集权主义影响的人。他们对凭借“橙色革命”上台的前总统维克托·A·尤先科 (Viktor A. Yushchenko)未能打击腐败、改革政府、消除创业障碍，并拉近乌克兰同欧洲的关系感到失望。

这一代人不怎么看电视，他们在网上获取新闻和娱乐。而且他们大多回避政治，直到最近才改变这一点。最近这些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利用了这一点。Ustream 和 YouTube 上的业余制作内容很快便把相关行动的新闻传播了出去。采用众筹模式的独立广播和电视网络也用了同样的低成本流媒体技术，在基辅的一个阁楼公寓里进行着直播。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人们密切关注着不得人心的别尔库特部队(Berkut)的一举一动；支持者也行动起来，挺身保护抗议者搭建的帐篷。

抗议者还坚持要求在示威活动中不能有明显的政党行为——无论是制服、标语还是演说。他们不希望活动被政府抓住把柄，后者会声称这些抗议不过是一次试图颠覆政府的政治行动。



然而即便有这些努力，支持欧洲的运动能否坚持下来依然是个疑问。多个右翼政党的代表——其中就包括全乌克兰自由联盟(Svoboda)，他的民族主义、排外、反智和恐同观念曾经令心系欧洲的乌克兰人十分头疼——已经早早地加入到了抗议人群中。

抗议者带着激动的神情反复表达他们作为欧洲人的一面，时常令人动容：他们强调礼貌、友好和整洁。为什么？因为这是“欧洲风格”。其他的一切都是落后的、粗鲁的、令人生厌的——简单说就是“苏联式的”，或称垃圾桶，这是在委婉表达对这个后苏联国家的失望之情。

偏保守派的乌克兰人有不同看法。他们把宽容、一视同仁和开放合到一起，统称为“宽容病”(tolerasty)，这个新词的意思是，那些向往西方的人是软弱、堕落和危险的。”性”是一个敏感问题：要想加入欧盟，乌克兰必须废除针对性取向的歧视政策。

根据这种观点，宣扬所谓的欧洲价值观是会令乌克兰家庭走向毁灭的。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论述。几十年来，宗教、言论、语言和文化在乌克兰遭到压制。像 1932 - 33 年大饥荒这样的悲剧从未得到正视。

活动人士深知这种恐吓战术的厉害。在其非政治性的表述中，他们试图缓解一个后苏联社会的恐惧情绪，毕竟这个社会才刚刚开始面对过去留下的创伤。

他们得到了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启发，比如政治哲学家、散文家米哈伊罗·米纳科夫(Mykhailo Minakov)，他呼吁抗议者吸取橙色革命的教训：和平示威、世代与文化上的团结，意识形态中立，要围绕着欧洲理念进行重新的整合，和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势力相抗衡。

即便没能成功地将乌克兰领导人推向欧洲，活动人士也可以继续发展一场关乎公正和团结的非暴力、非意识形态运动。

这些活动人士正在帮助建造起一个公民社会，虽然它还相当孱弱，其稳固与否，不全然是在街头验证的，更多是在家中。无论结果如何，在这场为自由的价值观而进行的战斗之后，这些价值观每天都会遭受挑战。

（翻译：陈亦亭、经雷）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6 张弘：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张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

“

社会的转型造成了乌克兰社会在历史宗教文化上的认同矛盾，经济发展上的道路之争，在政治上的民主危机。这三个方面的矛盾演化成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危机。

”

内容提要：自获得独立以后，乌克兰社会就面临着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乌克兰的社会转型在政治方面可以理解为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不仅要进行民族-国家的重新构建，而且还要进行民主-国家的构建。社会的转型造成了乌克兰社会在历史宗教文化上的认同矛盾，经济发展上的道路之争，在政治上的民主危机。这三个方面的矛盾演化成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危机。通过分析乌克兰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笔者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政治家如何去处置。乌克兰政治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过激言行是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差异问题演化成为危机的关键，而民族认同危机又增加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俄罗斯 乌克兰 国家认同 社会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认同概念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一般来说，国家认同是一个含有多重意义的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即所谓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 “制度认同”[1]。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定义应为：国民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语言、文化、传统、边界、制度、价值、利益和身份的一种自觉的认可和接受。民族国家认同是人类社会



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政治认同，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国家政权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情感，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从、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的基础[2]。

本文将国家认同问题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冲击了原有社会中的国家认同，在新的社会形态中需要重新构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对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转型是一种由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向现代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历史图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领域由非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政治领域由专制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文化领域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当今开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文化的转型[3]。

因此，对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乌克兰来说，不仅需要建立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更需要建立起稳定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乌克兰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过程也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它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二是民主-国家，它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4]。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稳定和完整都受此影响并出现了新的认同危机问题，需要重新选择发展方向和进行自我定位。此外，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各国内部族裔向原有的民族认同回归，基于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也强烈冲击着传统的国家认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独立后的乌克兰民族国家认同有些模糊和混乱。因此，社会转型中的乌克兰国家构建不仅包括民族 国家认同的重新构建，而且还包括民主国家认同的构建。二者在所有形式的集体认同中，是最具根本性和包容性的要素。

二、乌克兰面临的认同危机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它不仅要有基于民族本身的历史宗教语言的文化认同，也要有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经历一个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由于社会转型本身就是打破原有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和 经济体系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原来的体系。影响国家认同的各种基本要素在这个过程自然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家认同[5]。因此，本文中对乌克兰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族群文化认同和民主认同。



独立以来，乌克兰社会一直存在着国家认同差异。这种认同差异在政治家的激烈言行的动员下演化成为国家认同危机，并成为影响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最直接和最明显地表现是对乌克兰国家利益的认同，即“什么是乌克兰的国家利益”。民族国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乌克兰出现社会分裂和民族矛盾。在 2004 年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引发了乌克兰东西部选民的对立和冲突，并最终演化为激烈的街头斗争。在 2010 年总统大选前许多乌克兰国内政治分析人士曾认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应当是影响乌克兰选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计票结果显示，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州都支持亚努科维奇，而乌克兰族占绝对多数的州则都支持季莫申科。可见，乌克兰国内缺乏以民族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统一的国家性政党，主要政党实际上已经沦为地区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影响选民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民族性和地域性因素。选举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政党政治主张的差异，实质上是乌克兰国内潜在的国家认同危机。同样，在 2010 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优惠天然气换取黑海舰队基地续约协议后，来自乌克兰东部的民众拥堵在议会外表达支持，而来自西部的民众则在政府大楼前表达抗议和不满。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认为：乌克兰虽然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此要想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要解决国家认同问题[6]。

（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危机

关于“文化认同”，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7]。独立并不意味着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乌克兰曾经的统治者都对乌克兰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原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在乌克兰至今尚未完全消失，在乌克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也由此而来。尽管乌克兰语言和文化一直存在，但是已经基本上被“俄罗斯化”。有人甚至把乌克兰称为“区域国家”，意指它在种族、语言、宗教和社会经济上，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了永远的区域性裂痕[8]。

首先，如何真实地还原乌克兰历史及认识族群认同危机。围绕如何重新认识乌克兰历史的问题，在乌克兰社会和历史学界产生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深层次上是如何认识乌克兰过去的问题，这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以乌克兰人的视角来考察乌克兰



文化和历史，特别是俄罗斯统治乌克兰时期的历史，对于乌克兰国家认同的构建尤为重要。

在近代，大俄罗斯主义一向坚持从喀尔巴阡地区到太平洋区域内居住着操同一俄语、具有同样历史传统的、统一的俄罗斯人学说。约在 12~13 世纪，“乌克兰”(本意为“边区”)一词开始使用，随后，这一称谓逐步扩大到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并以这一称谓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然而，乌克兰当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土地分别被划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版图，乌克兰人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1648 年，乌克兰人民在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率领下起义，反 对波兰的统治。为了获得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帮助，赫梅利尼茨基多次表示愿意服从沙俄的领导。1654 年 3 月，双方签订了《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基本条约》，亦称《三月条约》。与俄罗斯的结盟也成为乌克兰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乌克兰历史发展的轨迹由此转向了俄罗斯。此后 200 年间，沙俄一直牢牢控制着乌克兰。俄罗斯的沙皇彼得大帝在乌克兰全面推行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重新构建乌社会结构。沙俄用刚柔并济的办法，同化了乌上层统治阶级，确立俄语的官方地位，把乌克兰语贬为“乡巴佬”语言，禁止乌克兰文书籍 和教科书的出版，强制乌克兰人抛弃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1917 年，沙俄爆发了“二月革命”，帝国瞬间解体，但随后成立的苏联政权继承了沙俄在乌克兰的一切权力。

乌克兰从属于沙皇俄国比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更长，而在沙皇俄国，乌克兰史形同禁学。研究所谓“南俄历史”无偏见的学者，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全都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的沙皇当局的怀疑和迫害。苏联继承沙皇俄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将它改为“统一而牢不可破的联盟”，以“俄罗 斯救星论”和“美化大俄沙文主义”，推行史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方针。20 世纪 20 年代末起，苏联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开展了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依靠政治高压建立了官方的乌克兰史学。乌克兰史学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其代表人物被打成“民族沙文主义者”。这类意识形态的整肃，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反复进行，许多乌克兰史学家受到谴责，罪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指民族分裂主义。这种政策在苏联史学界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乌克兰的独立标志着苏联官方修正史的终结，但乌克兰史学政治 化的后果异常严重，至今影响尚存。



在 1991 年乌克兰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时，乌克兰民族的概念其实远未成熟，更不要说国家认同感。乌克兰某些领导人重新启动对乌克兰历史，特别是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打开了乌克兰历史中沉寂多年的历史文化矛盾的潘多拉盒子。围绕如何重新评价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苏联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和大清洗运动等历史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乌克兰政府和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而俄罗斯政府拒绝承认 1932~1933 年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指出当时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在内的俄罗斯很多地方也发生了饥荒；这是一场悲剧，没有针对哪个民族的预谋。2003 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卡梅宁也曾在联合国第 58 届全体会议上表明了俄政府的立场。卡梅宁指出，俄罗斯政府认为，1932—1933 年乌克兰发生的是大饥荒，而不是“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悲剧”。尤先科总统上台后，积极推进对苏联时期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的历史清算。2006 年 11 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承认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从而再一次唤起人们对发生在 73 年前的那一悲惨事件的痛苦记忆。其实乌克兰社会内部对于大饥荒的评价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部分亲俄罗斯的议员认为该决议会招致俄方的不满。在这个决议的投票中，有 450 个席位的乌克兰议会中，只有 234 人参加了投票，勉强超过半数。最终该决议以 233 票赞成，1 票反对获得通过。很多议员在这一敏感问题上选择了回避和沉默。尤先科总统在 2010 年卸任前授予乌克兰有争议的著名历史人物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也是引发乌克兰东西部选民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把斯捷潘·班杰拉称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乌克兰西部认为，班杰拉是反抗苏共统治，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9]。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亚努科维奇就表示，尤先科应是整个乌克兰的总统，而不应是乌克兰一个地区的总统。尤先科的举动无助统一，将进一步造成乌克兰分裂。重新研究这些历史不仅让今天俄乌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而且也在乌克兰社会上造成新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其次，特殊的分裂历史造就了乌克兰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民族宗教是在某种特定的族群社会传统中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群体决定了特定的宗教生活。民族认同大都以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作为基础，宗教认同作为民族共同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层面，无疑是民族认同的文化信仰 基础，它们共同组成为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宗教渗透于它所在族群的政治、法律、经济和道德生活之中，并相应地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目前，乌克兰主要的宗教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信徒约占人口 85%的比例，天主教约占 10%，其他的还包括浸礼教、犹太教和马蒙教等。历史上，乌克兰曾经



长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东正教会，即听命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拜占庭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东正教信仰是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17 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控制乌克兰，强迫乌克兰推行“天主教化”，压制和迫害东正教会和信徒，引起乌克兰下层民众和哥萨克骑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发起反抗，并且寻求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支持和保护，终于使得乌克兰主要领土于 1654 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乌克兰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一些地区曾经被不同的外族政权统治，因此很难说乌克兰有一部在时间和地理上都完整的历史。

14 世纪中叶，立陶宛公国吞并了南罗斯，即现今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使基辅东正教总教区与俄国的总教区分离，而臣服于拜占庭教皇，这就是乌克兰东正教。1448 年俄罗斯东正教拒绝服从拜占庭牧首而宣告独立，这样在乌克兰就存在服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1654 年东乌克兰划归俄国后，乌克兰东正教的基辅主教又逐步脱离拜占庭，于 1686 年臣服于莫斯科主教。20 世纪初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成为依附于苏维埃制度而独立于梵蒂冈的宗教。进入 80 年代末，随着乌克兰争取独立步伐的加快，被禁止和处于地下的乌克兰自主正教重新开始活动。1990 年 10 月乌克兰自主正教教会牧首姆斯季斯拉夫宣布乌克兰自主正教独立于莫斯科东正教牧首。这样在乌克兰，东正教又分为忠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宗教礼仪使用俄语，而乌克兰自主正教的宗教礼仪则使用乌克兰语。两个东正教教派分裂时，曾就如何划分东正教教堂和财产发生争执。但在 1992 年中期，乌克兰东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合并，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到了尤先科总统执政时期，这个问题在 2008 年又被重新提出。

在颜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总统积极推进乌克兰宗教文化的“去俄罗斯化”和“脱俄入欧”运动。2008 年，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 1 020 周年之机，正式向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hlomew I)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其目的是要从文化和精神上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渊源，重要性绝不亚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动作。尤先科公开要求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表明乌克兰“脱俄入欧”过程正在从政治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准备以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密切宗教关系，来促成最后的“去俄罗斯化”。乌克兰的宗教认同差异虽不是对抗性的，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但人为地制造宗教认同的分裂实际上强化了乌克兰社会族群认同的差异。



最后，语言政策改革引发的族群矛盾。原苏联国家在获得国家主权独立之后，积极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维护自己的民族特征、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的努力是可以被尊重和理解的。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产生和形成有其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在这些国家里完全取消俄语的使用也是不可能的。

独立前乌克兰学校的教学以俄语为主(占 90%)，乌克兰语教学只占 10%，当时苏联的政策使乌克兰语遭到不公平的对待。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 1989 年制定了语言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政府提供条件保证俄语和其他语言的使用。当时苏共中央非常反对，乌克兰经过努力争取才得以通过，这部法律为乌克兰争取到了很大利益。乌克兰独立后，从 1992 年起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规定乌克兰语为乌克兰的国语，补充了乌克兰语在应用方面的条款。这个修订案虽经议会多次讨论，但直到颜色革命后的 2006 年才获得通过。独立以后的乌克兰政府积极推进乌克兰语的使用，逐渐把俄语挤压出该国的教育系统和政府与国家媒体之外，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乌克兰中学中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学校的比重%

年份	199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1 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	
乌克兰语学校	45	60	62.7	65	67.5	70.3	72.5	73.8	乌克兰族	77.8
俄罗斯语学校	54	39.2	36.5	34.4	31.8	28.9	26.6	25.3	俄罗斯族	17.3

数据来源：转引自俄罗斯国际人文政策政治研究所乌克兰分所根据乌克兰科学与教育部数据研究得出的成果[10]。

近年来乌克兰语面临来自俄语、英语的冲击，因此政府特别重视和加强乌克兰语的规范工作。截至 2008 年的数据，乌克兰全国有 21 500 所学校，其中大多数使用乌克兰语教学(69.7%)，有大约 1 305 所学校用俄语教学，还有 2 000 多所学校用乌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乌克兰的 学校里共有乌克兰语及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鞑靼语、希腊语等 18 种教学语言)[11]。乌克兰政府在许多公共生活领域推行乌克兰语和文化的同化政策，以消除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化政策影响，以及一些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化和罗马尼亚化影响。大多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国民以俄语为母语，俄语是全乌克兰中最通行的第二语言。不过，乌克兰中部和西部使用俄语的情况远不



如东部和南部。现在俄语应否成为乌克兰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因为俄语至今并不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在乌克兰说俄语者仍然不在少数[12]。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讲俄语的俄罗斯族裔和以俄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乌克兰人十分不满政府强行推广乌克兰语的政策，特别是在政府在逐渐减少对俄语教育的支持，以及限制俄语媒体在乌克兰的播出政策。

俄语应否成为乌克兰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每当乌克兰举行选举时，很多政客都承诺把俄语定为第二种官方语言；但是选举过后，这些承诺往往又被政治家们选择性的遗忘。尤先科执政时期实行的激进和强硬的语言政策造成乌克兰中部、东部和南部讲俄语居民的不满，进而招致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裔选民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抵触和矛盾。“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政府要求人们必须学习乌克兰语。现在学校同教师都订有合同，要求教师用乌克兰语讲课，否则可能被解聘。乌克兰的实践显示，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并不一定必须实行单一的国家语言政策，强制推行单一的主体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反而有可能扩大族群之间的认同差距，不利于同一的国家认同构建。

综上所述，乌克兰在历史、宗教和语言等问题的认同差异具有很大的地域性特点。乌克兰东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居民讲俄语居多，信奉东正教，在经济上 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要讲乌克兰语，多信奉天主教，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对俄罗斯统治的历史有着很深的敌意。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因此也传导到国家未来发展道路和对外关系问题上来。乌克兰人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乌克兰国家认同差异衡量的指标。根据乌克兰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乌克兰东部 81%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乌克兰中部 66.9%的受访者和南部 46%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而乌克兰西部 55%的受访者则认为俄罗斯是敌对国家[13]。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开始奉行乌克兰化政策，迫切地希望实现从大俄罗斯民族文化到乌克兰民族文化的转变，从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方面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乌克兰化政策是对历史上的外来政权强加给乌克兰社会的非乌克兰特征的矫正，主要内容包括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研究和强制推广乌克兰语言文化等。“去俄罗斯化”本身就是“乌克兰化”的代名词，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族群之间的认同矛盾。

(二)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引起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



乌克兰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多元化日趋明显。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乌克兰社会出现新的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20 世纪 90 年代广泛的私有化后果是，金融工业寡头控制了乌克兰主要经济命脉。有别于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金融工业集团对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能力更加严重，而官僚集团和强力部门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根据乌克兰顶级商业杂志《记者》2008 年 6 月 2 日的报道，乌克兰最富有的 50 个金融工业寡头的资产总值已经达到 1 120 亿美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两倍。这些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乌克兰经济命脉，而且还直接决定着乌克兰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命运。他们通过资助乌克兰主要政党，或者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来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和外交。金融工业寡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集团：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巴斯集团。目前顿涅茨克集团在政治上更倾斜于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保持距离，而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巴斯集团由于自身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倾向于与俄罗斯发展更加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乌克兰全国人口为 4 800 万，大体上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东乌克兰毗邻俄罗斯，人口 3 200 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工业，经济比较发达；而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西乌克兰毗邻欧盟，人口 1 600 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经济比较落后。1999 年，从俄罗斯经济有起色以来，与俄罗斯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东乌克兰地区也恢复了经济活力。相反，西乌克兰地区经济起色不大。乌经济东、西部发展失衡，东部要求密切与俄合作，而西部希望尽快融入欧洲。乌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俄罗斯和欧盟，传统优势出口商品是冶金、化工、机械、军工产品，而这些工业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仅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乌全国的 60%~70%。此外，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主要是波兰等国，但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乌西部地区被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每年因此损失数亿美元的外贸收入。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地缘性决定，前者要求密切与俄的合作，而后者希望尽快融入欧洲。

经济利益决定了东西部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而且这一因素今后还会更加突出。市场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单位化调控体系逐步让位给社会化调控体系，各种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争夺与对抗。传统的乌克兰社会分层出现严重的分化，各种社会阶层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同也从模糊统一到清晰分化。不同的历史记忆及政治、外交上的多元化倾向成为乌政局动荡的根源。基于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形成了国内林林总总、数目繁杂的次国家组织和团体，他们即使不寻求独立，也对国家认同形



成了强烈的冲击。乌克兰社会对于国家民主建设以及未来发展道路认识的分化是国家认同危机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国家构建中的民主危机

乌克兰在社会转轨过程中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是受制于历史传统、法律监管缺位、公民社会力量薄弱以及过于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影响，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真正有效地运行起高效廉洁的政府和政党政治。

首先，频繁爆发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降低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经在 2005 年 2 月议会中指出：“源自高层的腐败曾一直是乌克兰的头号问题。”[14]根据透明国际组织的报告，乌克兰从 2000 年到 2005 年期间一直是腐败指数居高不下的国家。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所 2004 年报告，乌克兰的反腐败指数从 1996 年的 26.7%下降到 2004 年的 18.7%，这说明库奇马执政时期的乌克兰腐败情况出现了恶化[15]。目前已经被公开的案例就有直接指向曾 担任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腐败案和曾经担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谋杀案。乌克兰检方在 1998 年指控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连科利用职权侵吞了上亿美元的乌克兰国有资产。1999 年，美国当局应瑞士和乌克兰的要求，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将他逮捕。2000 年 6 月，美国政府以通过美国银行洗钱、勒索、欺诈和转移盗窃财产等罪名对拉扎连科提起诉讼。2006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以洗钱、欺诈和勒索等罪名，判处拉扎连科 9 年监禁，并处以 1 000 万美元罚金。2000 年 11 月，以批评政府高层腐败问题而著称的乌克兰著名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突然遇害。随后，舆论纷纷指责时任乌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与此案有关。乌克兰社会党领袖莫罗兹宣布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就是“贡加泽案”的幕后主谋。莫罗兹称，国家警卫局军官米科拉·梅尔尼琴科向他提供了自己秘密录下的库奇马在 1998~2000 年间在自己办公室内的数百小时谈话内容的录音带。在这些录音带中有库奇马总统、总统办公厅主任利特温和内务部长克拉夫钦科三人的谈话，上面记录了当时他们正在秘密商议除掉贡加泽的办法。在贡加泽遇害两周年之际的 2002 年，乌克兰反对派再次组织大规模的“乌克兰不要库奇马”运动，要求库奇马下台。虽然库奇马成功克服了有关针对他本人的各种腐败指责，但腐败丑闻严重降低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更降低了普通居民对于乌克兰宪政民主制度的信任。政治腐败会削弱政府的行政体系，降低行政能力，并损害国家、公众的利益，败坏政府形象，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最终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成为诱发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一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经济转轨和政治发展，政



府往往会选择扩展权威，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以开辟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但这样容易导致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从而为政治腐败陡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其次，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摸索和适应的过程中，需要把外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本土文化和传统加以结合。处于社会转轨中的多民族国家如果不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达成广泛的共识，就很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16]。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纯粹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是人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它只涉及政治社会成员对政治的取向因素[17]。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政治文化可以是高度一致的，也可能是两极分化的，甚至是多级分化的。乌克兰社会目前就处在两极化的边缘，在国内政治体系的安排和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上有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在两极分化的政治社会中，大多数公民处于极端的两头。在这种文化中，政治领导人的任何政策建议都将招致相当部分公民的不快，整个社会往往处于不断的纷争之中，并且很可能走向政治上的分裂。处在转轨过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政治结构准则往往选择参与型的，而其政治文化却是地域型的。从地域型文化向参与型文化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打破地域体系，在这种参与过程中形成建设性的利益集团。移植过来的民主要在一个陌生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结果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政党竞争制度、广泛的民众参与。简而言之，就是建立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政党制度。由于目前的乌克兰国内政治文化处于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这些政治文化外在的表现都处于混乱状态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严重分裂里，身处不同亚文化社群中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观处于分散和游离的状态之中，因此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人们习惯于处理垂直的或纵向的关系，而不善于处理独立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导致现代的社会政治组织难以形成。面对突如其来的以追求个人平等、自由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民主选举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在乌克兰 2004 年和 2010 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在完善民主政治和经济政策上大同小异，争论和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问题，这使得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偏好更多地来源于历史文化认同，来源于对候选人是否是“自己人”的认定。各个政党、团体或个人在利益、权力的驱使下，必然展开对权力的争夺，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规范的约束，这使不少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不受约束，或约束很少。人们无所不为，政治斗争处于失控状态，未能



在法律框架下有序进行，从而容易达到尖锐的程度，引发街头政治、暴力冲突、流血斗争，使政权处于动荡之中。2007 年 4 月，当时的总统尤先科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之间围绕国家行政权力划分发生纠纷。尤先科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议会多数派拒绝解散，导致乌克兰政治陷入僵局。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不断升级 ，在总统和总理互相指责的同时，两派的上万名支持者冲上街头，进行大规模集会和抗议。相持不下的局势使乌克兰几乎处在暴力冲突的边缘。

围绕是否应该加入北约问题，乌克兰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以尤先科为首的政治力量积极主张加入北约，拒绝让俄罗斯继续租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黑海舰队基地。而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政治力量则不赞同加入北约，并且不反对俄罗斯继续租用乌克兰的港口作为其黑海舰队的基地。两派政治力量围绕是否加入北约和黑海舰队基地问题的争论直接导致激烈的街头斗争。2006 年 5 月，尤先科执政时期的乌克兰政府未经议会 批准，允许参加北约“海上微风 2006”联合军演的美军船只和军事专家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遭到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当地居民不仅连续数日封锁港口，阻止美军船只卸运军用物资，还在美军专家下榻的乌国防部疗养院门口举行示威活动，阻止其前往演习地点。两周后，美军只得在抗议声中撤离克里米亚，军演亦被迫取消。2010 年 4 月，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俄乌两国迅速达成的延长俄黑海舰队在乌境内驻留期协议，同样在乌克兰国内引起强烈反应：数千名反对该协议的示威者集会抗议，反对派抨击亚努科维奇“出卖国家主权”，违背宪法，甚至扬言弹劾总统。如此的事例在乌克兰独立以来的短暂历史中数不胜数，可见如不能在乌克兰形成和培养起同一的政治文化，将十分不利于实现民主认同的建立和国家政治稳定。由于不能克服地域型的政治文化，参与型的政治准则被地区利益和族群利益绑架，因此导致在现代国家重建过程中，乌克兰政党之间的竞争也就演变为族际认同和区域认同问题。

乌克兰在民主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具体表现在新生的民主制度固化过程中的困难。政府更迭频繁、腐败、寡头干政和街头斗争不断困扰着乌克兰社会。各种政治派别围绕政治改革、权力分配、组阁、选举问题的争斗经常陷入僵局，进而演化成为街头斗争和革命，这种民主国家构建的危机直接导致了乌克兰独立以来政局动荡。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民族和地区之间矛盾升级，进而导致从民主政治问题蔓延到社会民族之间在历史、现实问题上争论，民主认同危机也就演化为民族认同危机。



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里，多数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都选择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这也导致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越来越依赖于民族国家认同。乌克兰在实现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为我们提出了下列思考。

1.乌克兰某些政治家的过激言行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表面化。其实，乌克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 300 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融合，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民族关系，两个民族之间有着难以割舍血缘的关系。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1989 年人口普查数据，在俄罗斯生活着 436 万的乌克兰族人，占俄罗斯总人口比例的 3%。据俄罗斯学者不完全统计，大约有 2 000 万俄罗斯人拥有乌克兰血统[18]。据俄罗斯 2002 年的官方统计，有 23 万合法的乌克兰劳动移民在俄罗斯从事短期或者长期工作。同期，在乌克兰生活的俄罗斯族人也达到了其总人口的 17%[19]，在乌克兰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口占到乌克兰总人口的 29.3%[20]。在这样两个民族融合如此高的国家间并不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和仇恨。然而，在历次乌克兰选举中出现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议题却被乌克兰政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政治化，试图借助这些问题作为动员选民的工具。如果没有民族主义政治家所创造的强迫人们进行两难选择的气氛，大多数人的自我认同可能选择多样化和完整的认同。政治领导人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乌克兰社会两极化和冲突性的政治认同，可见政治家的品质在国家认同的培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2.民族认同危机增加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讨论民主化问题不能回避国家性问题，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是建立在普通民众参与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主义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身份界定的可能性。对于新兴民主国家而言，不解决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就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形式，这些论断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成立的。民族国家认同对于转型国家的民主巩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民族国家认同是新兴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能否成功的基础性因素。

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源于其族群认同，而族群认同源于其基本的文化特质。这里不仅包括源自父母基因上的生物遗传，也就是个人生理上的特征(如肤色、脸部轮廓等)，还包括经由所属家庭的中介而取得社会性的特征(例如语言、宗教、历史及起源)，这些基本的文化特质构成了身份与认同的基础。因为人类属于固定的族群共同体，因为遗传进化和血缘关系，族群总的来说是一种优先的、既定的而且是强有力的社会约束。族群联系具有逻辑和时间上的优先权，具有强制的力量和情感。族群约束压倒了其他的忠诚，也就增加了民主



国家构建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社会转型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较容易催化其内部族群的分离倾向，发生冲突的机会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虽然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已经从制度建设发展到民主巩固的阶段，但是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民主巩固问题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影响民主巩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认同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但是国家认同问题确实是影响民主巩固的基础条件。处理好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将是乌克兰民主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比较政治的发展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最重要问题是国家认同。在存在国家认同危机的情况下，“民主”甚至会变成煽动族群冲突乃至国家分裂的工具。只 有当“我应该属于谁”这样的国家认同解决以后，民主选举才不至于演变成为内乱。

注释：

[1]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15 页。

[2]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年第 1 期。

[3]李钢：《论社会转型的本质与意义》，载《求实》2001 年第 1 期。

[4]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载《东南学术》2006 年第 4 期。

[5]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 年第 6 期。

[6]笔者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访问乌克兰期间专门拜访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先生，他就乌克兰与俄罗斯天然气合约和黑海舰队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8]Oleksandr RAR，AUkrainian Rift，in“The Day”，16 November 2004.http://www.day.kiev.ua/127579/

[9]斯捷潘·班杰拉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二战前曾因参与谋杀波兰政府高官，被波兰方面抓捕入狱。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被释放，并随即聚集起一支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武装力量。在德军入侵苏联后，以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依附纳粹攻击苏军。不过，试图依靠德国恢复乌克兰独立的班杰拉在希特勒那里并不吃香。1941 年德军进



攻苏联战役打响后不久，班杰拉就被软禁起来，后来又被送到集中营。但是，由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党卫军加西利亚师，仍然为纳粹效力，并参与了 1944 年镇压华沙起义的行动。1959 年 10 月 15 日，班杰拉在慕尼黑寓所外被苏联克格勃击毙。

[10]数据来源：Директор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МИГПИДР Владимир Малинкович， 10Марта 2005Г. http://www.igpi.ru/info/people/malink/1111152776.html

[11]根据乌克兰 R&B Group 调查公司 2008 年的民调数据，http://www.regnum.ru/news/964262.html

[12]根据乌克兰 2001 年人口统计，大约占总人口 29.3%乌克兰国民以俄语为母语。

[13]Пироженко В. Состоя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сферы Украины//“2000”. 27января 2006.

[14]周晓鹏：《乌克兰橙色危机：腐败问题背后的政治博弈》，载新华网 2005 年 9 月 9 日。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05-09/09/content_3466917.htm.

[15]D. Kaufmann，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www.worldbank. org/wbi/governance/pubs/govmatters4. html)，2005.

[16]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 页。

[17]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版，第 95 页。

[18]Городяненко В. Г. Проблемы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7.№2.С. 15 ~ 20. http://www.ecsocman. edu. ru/socis/msg/310848.html

[19]数据来源：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http://www.ukrcensus. gov. ua/eng/results/nationality _ population/nationality_6/n56?data1=1&box=5.6W&out_type=&id=&data=1&rz=1_1&k_t=00&id=&botton=cens_db2



[20]数据来源：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
http://www.ukrcensus.gov.ua/eng/results/general/language/

（原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 年第 6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7 柳建龙：从季莫申科案看乌克兰的法治与民主困境

柳建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

“

或许可以说，季莫申科案之所以“一石而千层浪”，并不是因为她是否真的犯有政府所指控的各项罪名，毋宁是该案所反映的乌克兰政治现状以及未来的政治走向——即现总统亚努科维奇将把乌克兰带向何方。也正是后者才使得季莫申科的锒铛入狱具有了殉道者的英雄主义色彩，从而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态度去细细品味。

”

“橙色英雄”锒铛入狱

2011 年 10 月 11 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地方法院作成判决认定：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滥用职权干预乌克兰和俄罗斯 2009 年签订的天然气供应协议，致使乌克兰进口俄产天然气价格高于多个欧洲国家，已经触犯乌克兰相关刑法，故而对她判处 7 年有期徒刑并 1.5 亿格里夫纳（约 1.9 亿美金）罚金以弥补由她这一行为给国家天然气公司造成的损失。除此之外，在该判决作出之后，乌克兰检方又对季莫申科提出了多项新的指控，其中包括两项同“乌克兰统一能源系统”集团公司拖欠俄罗斯国防部的债务、逃税有关的指控和一起涉及采购医疗救护车，以及挪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资金有关的指控，等等。

前政敌的“全面胜利”



对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而言，应该说，他取得了与反对派斗争的“全面胜利”：一方面自己在 2010 总统大选中赢了季莫申科，一雪 2004 年与尤先科竞选总统败北而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之耻，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将季莫申科赶下了总理宝座；另一方面，自己也报了当年季莫申科等反对派对自己的“刑事诋毁”一箭之仇，坐实这一头号政敌以及她的“帮凶”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各项罪名，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扔进监狱里；最后，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法院对季莫申科所作的有罪判决一旦生效，则毫无疑问，她将无法参加 2012 年的议会选举，更不要说 2015 年的总统选举了。季莫申科这一“眼中钉、肉中刺”一除，不仅天下英雄再无人堪当敌手，更无人“敢当”敌手，自己当然稳操 2015 年总统选举之胜券，真可谓“三喜临门”。

季莫申科的“美丽陷阱”

然而，虽则“三喜临门”，亚努科维奇却未必能高兴得起来：一方面，早在逮捕季莫申科被逮捕之初，欧美各国以及俄罗斯就表示对此案高度关注，并且不断地对一意孤行的亚努科维奇发出严厉的警告，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警告的严厉程度也是变其本而加其利；而基辅地方法院的判决一经做出，欧盟和俄罗斯立即作出谴责，认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并敦促乌克兰当局确保上诉程序的公开和公平；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代表欧盟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一旦该判决得以执行，则欧盟将重新认真考虑对乌克兰的各项政策，这可能包括暂缓签订双边政治联合与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乌克兰加入欧盟并融入欧洲的步伐将不得不放缓。并且由于亚努科维奇 10 月 17 日在总统办公室里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拒绝重审季莫申科案。欧盟乃于翌日公开宣布，推迟亚努科维奇原定于 10 月 20 日出访布鲁塞尔并与推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面的计划，直至“更有利于欧乌双边关系取得进展的时候”。而普京也认为，自己实在难以理解，究竟是因为什么判季莫申科 7 年有期徒刑。——或许恰如此前《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所指出的，对亚努科维奇而言，指控季莫申科，不啻于南辕北辙。

因为：首先，不管其结果是亚努科维奇所愿意看到的与否，季莫申科一案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使得亚努科维奇离自己 2010 年大选所设定和承诺的执政目标愈来愈远。在 2010 年大选时，亚努科维奇阐述自己的执政目标时，特别强调自己上任之后，“首要任务是团结乌克兰，消除因两大政治阵营对抗而造成的东西部社会分裂现象；在国内，推行大规模改革，促使乌克兰克服经济危机，争取 10 年之内跻身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前 20 强的行列；对外政策将会建立在同时与俄罗斯和欧盟发展互利友好关系的基础之上，优先与俄罗斯解决能源

稳定供应问题，继续与北约合作，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而实际上，亚努科维奇上台后所采的政策实际上与各该目标背道而驰：其一，自他 2010 年 2 月就任乌克兰总统以来，当局就对尤先科政府的多名政府官员提出渎职或者贪污的指控，不断有前政府高官被捕和逃亡，其中包括前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科尔尼丘克、前内务部长卢岑科、前经济部长达尼利申等，当然，还有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开始的这一系列对于前反对派的政治和法律攻势在多数人看来无异于此前的政治清洗，而这种成王败寇的历史重演，正如某些人所指出的，在相当意义上表明了：乌克兰当局不仅在开民主的倒车，甚至可会能使之前颜色革命所取得的些许成果灰飞烟灭。虽然，包括亚努科维奇在内的政府当局都在强调民主，然而这种所谓的民主是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上的，除了与执政党保持紧密合作或者效忠于之，将别无选择。而这种高压手段毫无疑问将进一步激化既有的两大政治阵营的矛盾；其二，尽管亚努科维奇试图采取一种更具实用主义的特征的政策，平衡处理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即无论是经济、安全还是外交上都不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避免此前政府一边倒的作法，既不一边倒向俄罗斯也不一边倒向欧美，而是以“多维外交”的方式，重新确定乌克兰实质上的“不结盟”选择。然而，从欧美和俄罗斯的反映来看，亚努科维奇的这盘棋可谓满盘皆输。《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的批评可谓一阵见血：尤利娅·季莫申科的判决的确开启了乌克兰同其最重要的政治伙伴——俄罗斯、欧盟及美国关系的新阶段。乌克兰政府下了全部赌注，但真搞不懂亚努科维奇如此究竟意欲何为！

其次，与其说对季莫申科进行定罪量刑是亚努科维奇政治斗争的胜利，毋宁说这更是季莫申科的战略性胜利。尽管亚努科维奇对西方社会的质问——“我们究竟要为社会传达出什么样的信号？只要身为反对派成员就可以犯罪吗？”——并非毫无道理，而且季莫申科也未必没有刑法上的可责性——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季莫申科也有不少劣迹，如：2000 年，她曾被起诉犯有走私、行贿和偷漏税等罪名；2004 年，她被俄罗斯指控在任统一能源公司总裁期间向俄国防部官员行贿从俄罗斯走私大量天然气，季莫申科和丈夫因而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季莫申科担任总理期间乏善可陈：在政治上，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在执政时未能履行革命时对人民所作的承诺，切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革故鼎新，发展民主和法治；在经济上，截止 2009 年，乌克兰居民收入缩水了 15%，通胀率达到了 12.3%，国家破产几近破产，而相比之下，虽然经历东欧巨变，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一样凋敝，但早在橙色革命之前，其经济已经渐有起色，以 5%的速度在增



长。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在橙色革命之后的几年里，当年的“英雄们”一直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政治改革和民生问题。也正是如此，再把选民重新推向他们之前革命的对象，亚努科维奇。——然而，即便如此，橙色革命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未被抹去，季莫申科仍然是“乌克兰玫瑰”！更何况她“灰姑娘”般的人生经历、端庄优雅的言谈举止、强硬的政治主张早已成为了乌克兰的传奇。在这样的背景和时机下——尤其是季莫申科阵营在选战中败给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情形下，后者选择对前者提出刑事指控，人们不仅会怀疑现总统的真正动机，当然也会更多地对季莫申科投以怜悯之心。故对季莫申科的这次审判无异于在政治上给她加了分。

最后，就季莫申科一案而言，亚努科维奇已经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早在 10 月 12 日，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便已指出：“乌克兰高层要手腕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当然，可以打退堂鼓，正如亚努科维奇暗示的那样：判决不是最终的，接下来还有上诉法院，不过总的来说遗憾的是影响了乌克兰融入欧洲。然而，完全撤销判决，即受到各方压力的影响，基辅官方这样做将令自己名誉扫地。而上诉法院减轻判决是可以的，但这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本身。这样一来，就得继续不顾一切的干到底。”而在 10 月 11 日基辅地方法院判决作出之后，又对她进行漏罪立案和指控毋宁恰恰印证了这一论断。

不攻自破的谎言

从以上种种来看，亚努科维奇可谓作茧自缚、咎由自取。然而，对他的指责或者对季莫申科的同情是否有失偏颇呢？毕竟季莫申科并非不具有刑法上之可责性。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检视亚努科维奇上台后的政治举措——倘其路线的确是朝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前进的，当然各种批评也就不攻自破；反之，则对亚努科维奇的谎言也就被曝露无遗了。那么，亚努科维奇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政治举措呢？

首先，巩固总统的权威。在亚努科维奇重掌大权不到一年的 2010 年 10 月 1 日，由他所任命的乌克兰宪法法院便宣告 2004 年 12 月 8 日乌克兰议会所通过的第 222 号宪法修正案无论从审议程序还是表决程序上看都是违宪无效的。该修正案是 2004 年“橙色革命”取得的重要成果，旨在扩大议会权力，削弱总统权力。根据这一修正案，乌克兰政体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由总统－议会制过渡为议会－总统制：议会多数派负责组建内阁；除外长和国防部长由总统提名外，其他内阁成员人选由总理提名并由议会批准任命；议会拥有解散政府的权力。换言之，该判决意味着 1996 年宪法效力得以全面恢复，总统－议会制卷土重来。而



这对亚努科维奇而言，则意味着他将获得与库奇马时代同样的对政府掌控的权力，有权提名总理并任命和解职内阁成员，而无须经过议会同意。

其次，加强对司法的控制。尽管早在上任伊始，亚努科维奇辄宣城要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独立、加强人权保障，恢复社会和公民对司法和执法制度的信任。并强调指出，“只有进行全面的司法改革，才能真正体现国家政权的民主性，建立一个强大、公正、民主的共和国。”然而，随着他将自己家乡地区的政治追随者安插到宪法法院和总检察院，外界对司法的独立性的质疑更是有增无减。而前述宪法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是司法不独立的一个表征。此外，分权与制衡本身是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现体制之下，作为人民意志之代表的议会和内阁尚且不能与总统制衡，更何况既无刀剑也无钱袋的司法机关？而就季莫申科案而言，亚努科维奇的暗示——判决不是最终的，尚有挽回的余地——诚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倘司法真的独立、真能独立，试问何来总统回旋的余地？！

最后，打击异议分子。正如乌克兰基辅世界政策研究所所长阿廖娜·盖特曼丘克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时所明确指出的，有很多迹象表明对季莫申科的案子是有政治动机的：“首先，在乌克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名前政府官员因为某项政治协议而被审判，尤其是因为签署了一份国际双边协议。……显然，季莫申科被当做了目标，她是亚努科维奇的眼中钉；……最后，一个政府的一大批官员面临非常可疑的腐败和滥用权力指控，这在现代欧洲历史上尚无先例。”

综上观之，亚努科维奇的政治用心可谓昭昭。

乌克兰的出路

或许可以说，季莫申科案之所以“一石而千层浪”，并不是因为她是否真的犯有政府所指控的各项罪名，毋宁是该案所反映的乌克兰政治现状以及未来的政治走向——即现总统亚努科维奇将把乌克兰带向何方。也正是后者才使得季莫申科的锒铛入狱具有了殉道者的英雄主义色彩，从而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态度去细细品味。

申言之，季莫申科案所体现出的紧张关系至少在外观上表现为后发达国家所不得面对的一对矛盾——即民主和法治的矛盾。一方面，在多数后发达国家中，不仅民主尚未健全，法治更是如此；而另一方面，肩负着这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中坚的部分，基于各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或多或少都陷于经济或者政治的污泥之中难以自拔——以致身负多种需要等待“救赎”的罪恶。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如果进行大规模的



清算，能幸免者当然也就微乎其微；故而，倘执政者用心险恶，这种形式上的合法清算毫无疑问也就成为整肃异己最为有力的工具。而其实质效果，尤其在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形下，不止在于令那些确有违法行为的政敌身陷囹圄，让异议者噤若寒蝉，更会断送民主与法治，进而为独裁与专制铺平道路。

然而，当然不是说，为了消除这种表面上的法治和民主的矛盾——就应该做到：只要是异议者就可以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其实无论何人、无论其政见如何，只要敢于破坏民主和法治秩序，都不应该逍遥法外。问题只在于：有没有一整套公正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在以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时是真的为了贯彻宪法和法律的所代表的人民意志，抑或是包藏祸心，以法律之名而行罪恶之实。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览┫

9-8 廖笛杉、孔寒冰：转型成绩单：东欧剧变这 23 年

廖笛杉，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孔寒冰，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

这个地区从来都是大国舞台。大国之间的交往最后有得有失，但失利的后果都是这些小国来承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这些国家这么“乱”。因为这种集体漂移的特性，恐怕几十年后，由于大国关系的变化，它们或许会集体漂移到东方或者是其他的地区。

”

乌克兰和波兰作为东道主举办 2012 年欧洲杯，这是东欧国家首次浓墨重彩登上世界核心舞台。这两个昔日意识形态相近国家合作举办这一盛事，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乃至东欧国家 20 余年来政治与经济转轨的成绩单。 谈及过去的东欧（而今的中东欧）地区，无人否认在 1989 年剧变及转轨之后，该地区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部分加入欧盟、享受种种变化带来的自由。

但转轨亦带来“撕裂”之痛：通货膨胀与政局混乱随之而来。人们开始担心，中东欧转轨的背后，是否藏有巨大的隐忧。

中国著名中东欧专家、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寒冰，长期从事中东欧的教授与研究工作，近几年来，他曾多次游走了地理意义上的东欧、中欧和东南欧的一百多个大中小城市。本报记者于 9 日专访孔寒冰。



他对记者解释道：东欧是冷战期间的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与西欧相对，在地理位置上指的是中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这些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动或被动地追随苏联，政治上曾经由共产党执政，经济上又采用计划经济体制。

冷战结束后，地缘意义上的东欧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地理位置上的中东欧。

两种转轨：自由民主或民族分裂

《21 世纪》：中东欧国家 23 年来的转轨是否措施得当？其中是否藏有隐忧？

孔寒冰：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是一个形式复杂、内涵深刻的过程，以往笼统的概括为“和平演变”并不恰当。

这些国家有一个在苏联模式共存的大背景，但在各国具体转轨过程中差别还是很大的。比方说，转轨有经济改革、政治转轨、外交转轨多方面，其中前两者就是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演变为政党政治和市场经济。中东欧各国采取的都是政治先行，可政治转轨的模式和过程并不一样。

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由民主式的政治转轨和民族分裂式的政治转轨，他们都是在建议西欧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

自由民主式的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地区的斯洛文尼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众政治选择由感性渐渐转为理性， 政党政治也逐渐成熟。

另外，就是民族分裂型的政治转轨，宗教、民族问题在中东欧向来比较严重。比方说克罗地亚、波黑、南联盟、马其顿等几个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的国家，虽然形式上也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 形成左中右、多党派的分野格局。但是受到民族矛盾、外部干预等因素的困扰， 这几个国家不仅民主化进程缓慢， 还出现了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波黑战争还有 1999 年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转轨，与西欧比较起来， 在中东欧的政党政治仍显得不完善、不成熟。中东欧国家的多党制也并没有完全改变特权阶层和权力腐败问题。

《21 世纪》：有一种说法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比较失败，尤其是经济方面，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方案都是西方经济学家设计的。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就是佐证。



孔寒冰：这个观点我个人完全不同意，首先从反面看，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希腊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很严重。说明这不是中东欧国家的问题，不能有点什么事情就要求回归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再三强调，这个地域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差异性。这是非常现实的。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人均 GDP 超过两万美元，但同地区有的小国只有几千美元。受到批评的"休克疗法"在波兰可能不成功，但是其他国家也并不都实施这个方法。

中东欧转轨采取的方式是政治先行，但经济转轨并不是不重要。在这过程中，出现问题，发生困难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用现在的经济危机来证明它们的不成功，我认为是过于简单化。

政党格局的成熟与民众的理性化

《21 世纪》：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衰退，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等一系列反抗运动。另一些人则对"过去时光"引以为豪，出现了所谓东德式怀旧和南斯拉夫式怀旧。

孔寒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答案恐怕不宜单化。举个例子来说吧。

我曾到过罗马尼亚的根恰公墓中，齐奥塞斯库夫妇从两座不用真名的孤坟到用真名合葬，从怕人掘坟毁尸到时常有人献花，这是一个特别的、反映罗马尼亚的社会态度转变的现象。国内有文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更多的人开始以肯定眼光怀念起齐奥塞斯库及其时代了。

但是，我不认为罗马尼亚人是在怀念过去，反而说他们是在否定现实更贴切。

因为在中东欧各国中，罗马尼亚在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民主是有了，可尔虞我诈的混乱政治也出现了；财产私有化了，可富裕却属于暴发户。首都布加勒斯特几乎看不到什么新的建筑，道路到处都是坑洼，各种公共设施多半也都年久失修。

转型成绩单：东欧剧变这 23 年

在很大程度上，罗马尼亚，也代表了其他转轨的国家。它们面临的问题本质上说也是原有社会制度的后遗症，还没有能确立起不随政党更替而改变的根本性法律规范。创建一个健全社会，各国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我认为，即使中东欧民众对现实的不满，但赞扬齐奥塞斯库、或者想回到那个时代的人肯定是不多的。

《21 世纪》：经济衰退使民众和专业人士寄托到政治要求上，左翼重新回归，前东欧各国的左翼政党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

孔寒冰：中东欧各国政坛已经形成了左、中左、中右、右阵线分明的政党格局。左翼的回归表明了地区反共浪潮的消退，社会逐渐走向理性化，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或政党集团的紧张关系也变得缓和起来。一方面，中东欧民众对各种政党的态度不再根据感情上的好恶， 而转向它们的业绩。

另一方面各国缺少执政经验的民主派相继在大选中败北。社会民主党抓了这个机遇， 逐步明确自己的有别于自由主义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 日益赢得民众的支持， 陆续上台执政。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所谓的东欧共产党“东山再起”。

第一， 这些政党已变成了西欧式的社会民主党， 与原来的共产党完全不同；

第二， 它们是在议会民主框架里以其可以吸引民众的政策主张上台执政的， 与过去的权力垄断完全不同，选民在选举中投谁票也不再根据这个党与共产党有什么历史瓜葛。

第三，各种类型的政党都认识到多党政治的规则就是各党轮流交替执政， 因而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而不是凭借暴力冲突来反对选举结果。与此相适应， 左翼、右翼阵营内部经过几年的分化重组， 阵线分野也逐渐清晰。

集体飘移

《21 世纪》：除去腐败频生、经济疲弱等等问题，从苏德矛盾到苏美之间的角力，中东欧国家都似乎一直在寻找平衡，从你的亲身经历，是否也感受到了这种“逃不出的大国阴影”？您认为“回归欧洲”是否是解决之道？

孔寒冰： 你说的情况的确是有，观察这个地区许多年，我感觉大的文明一直主宰着这个地区的独立。

我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东欧这些国家一直处于“集体漂移”过程当中。它们很难决定自己的归属。



我曾到访过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小国，发现它们很难保持自我。美国的大使馆占地都是上百、上千平米，但是其他的使馆或许只是在老城区楼房中的一个单元。

中东欧地区向西是天主教文明，向东的是东正教文明，南边则是伊斯兰教文明。结果，作为多种文明交融的地带，中东欧很难形成一个文明上的认同。

另外，这个地区从来都是大国舞台，在二战之前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和苏联有联系，但后来又与苏联结盟，至冷战以后再次全部回归欧洲，除了克罗地亚以外，中东欧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都加入了北约和欧盟。

但是，中东欧回归欧洲也不是那么的简单。比方说媒体在报导北约和欧盟东扩时，是否注意中东欧这些国家怎么想？没有人考虑到。大国之间的交往最后有得有失，但失利的后果都是这些小国来承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这些国家这么“乱”。

因为这种集体漂移的特性，恐怕几十年后，由于大国关系的变化，它们或许会集体漂移到东方或者是其他的地区。

（原载于《21 世纪经济报道》）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9 莱谢•巴塞罗维茨：波兰成功与乌克兰不成功


莱谢•巴塞罗维茨（Leszek Balcerowicz），曾任波兰副总理，财政部长，波兰国家银行主席，现为华沙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

从乌克兰终结共产主义并赢得独立迄今已有 20 多年了，为何这个国家依然深陷经济泥潭，并依然运行着一套在欧洲激起众怒的专制政治？当一个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发展缓慢且贫穷不堪的时候，我们无法将其归结为天灾或者资源限制，而是要把矛头指向一个坏政府所执行的坏政策上。

”

政治和体育经常会成为某种煽动性的混合物，正如当前围绕着 2012 年欧洲国家杯--该项赛事由乌克兰和波兰合办--的论战所体现的那样。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还有另外一些欧盟领袖都声称会抵制在乌克兰境内举办的部分赛事，因为该国囚禁了其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以及其他一些反对派。

从乌克兰终结共产主义并赢得独立迄今已有 20 多年了，为何这个国家依然深陷经济泥潭，并依然运行着一套在欧洲激起众怒的专制政治？当一个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发展缓慢且贫穷不堪的时候，我们无法将其归结为天灾或者资源限制，而是要把矛头指向一个坏政府所执行的坏政策上。

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想法相反的是，最恶劣的经济崩溃并非源自于自由市场的紊乱，而是来自于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为确保那些最险恶的人道和经济灾难免于发生，就必须对政治权力加以限制并维持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

对此我们可以用 2012 年欧洲国家杯两个主办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作为见证。波兰的 GDP 在过去 20 年间几乎翻了一倍，而乌克兰的产出却依然维持在社会主义制度倒台那一年



的水平。总体来说，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都比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要好（波罗的海各国除外）。

经济增长并不仅仅关系到生活的品质，也与生命的数量有关。所有中欧国家的儿童死亡率在过去 20 年都有所下降，尤其是波兰--从万分之 17 降到了万分之 7。在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人们的期望寿命从 71 岁增加到了 77 岁，其他中欧国家也实现了类似的成就。

相比之下在乌克兰，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仅有轻微下降，从万分之 25 变成了 24，而预期寿命则从 70 岁下降到了 68 岁。俄罗斯的状况也与此类似。

共产主义倒台后的纪录显示那些改革最成功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民主的国家--事实上跟任何西方国家同样民主。而最糟糕的经济数据则来自于那些与民主分道扬镳的国家。

民主并不是什么万灵丹，但不民主的政权通常会采取一些比民主政府更糟糕的经济政策。前者一味巧取豪夺，规则反复无常，最终造成了一个恶劣的营商环境。

另一大危险则是重税。政府大量支出时通常伴随着高昂的官方税率。而在这些支出中用于社会方面的支出往往不得要领，只能让少部分的穷人受益。此外，与贪污腐败有关的款项也应当被计入税收之中。而大多数企业都会受到这两类重税的冲击--这些税项是如此沉重以致连经济都无法增长，一如眼下的乌克兰。

此外，在财产所有权保护上的不平等--比如说权贵资本主义--意味着有一小部分的企业会得到特殊照顾。他们能享受低税率，或者他们的竞争对手会遭到当局的突击搜查。由于国家利用其下属机构来遏制竞争--无论是非正式地利用针对财产所有权的执法，或是正式利用种种贸易管制政策--权贵资本主义不仅不公平，而且也缺乏效率。某些生意人或许能获得成功，但整体经济却乏善可陈。没有了竞争，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没什么大区别。

波兰在过去 20 年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初始就在政治和商业间实现了明确的区分。规则一视同仁，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通过废除垄断和向全世界开放市场，波兰引入了大量的竞争。

此外，波兰避免了经济的过度膨胀以及随后产生的大幅衰退。大多数这类膨胀都来自于错误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西班牙、爱尔兰、美国、英国，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各国最近出现的泡沫膨胀-爆发连锁反应都说明了这一点。乌克兰也一样，2004~2007 年间的大泡沫之后就是 2009 年相当于 GDP 总额 15%的收缩--也是其国内政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乌克兰在过去 20 年间的纪录说明仅仅抛弃社会主义是不够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建立自由市场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点，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必须迫使权贵资本主义走向终结。而乌克兰的公民们要么进一步向他们的中欧邻居看齐，要么就容忍过往错误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紊乱持续下去--这也将令他们更加被人远远抛在后面。

（原载于财经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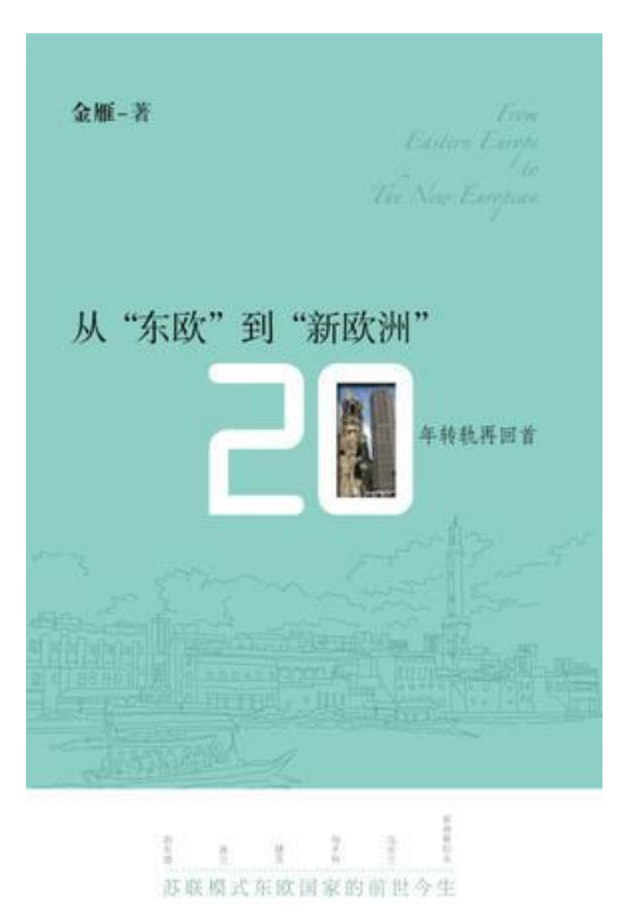
拓展阅读：

彭劲秀：乌克兰人民不忘大饥荒的惨痛历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4011098704.html



【荐书】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



本书是一个历史学者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现状的观察与评论。有现象，有分析，对于读者了解目前″新欧洲″的真实情况，颇有助益。分上篇″金融危机后回首看东欧″，中篇″波兰独立之路与南斯拉夫民族独立问题″，下篇″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共 15 篇文章。以作者在《经济观察报》开设专栏撰写的文章为基础，修改编订而成，也是之前出版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 2004）一书的姊妹篇。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主编：方可成

编辑：刘岩川

设计：池春荣，潘雯怡，常仁豪

校订：方宜农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